

交談、商業與文雅—— 丹尼爾·笛福與十八世紀初英格蘭 的文雅文化

陳建元*

十八世紀初期英格蘭是文雅文化發揚的時代。在目前的學界討論中，笛福的著作與此文化之間的關係仍有討論的餘地。本文旨在透過將笛福的作品與咸認為文雅文化代表人物(如沙夫茨伯里與阿迪生)的著作比較，指出笛福與他們皆主張交談以及商業是文雅文化中的兩個關鍵，也將文雅文化再細緻分殊，指出他們各自針對的不同讀者。沙夫茨伯里針對的是貴族、阿迪生針對的是鄉紳中產階級，而笛福針對的則是商人階級及閱讀小報的群眾。本文以笛福的著作為主要史料，並輔以當代其他文雅作家的著作。本文第一部分介紹笛福的生平以及其中影響其對文雅看法的關鍵背景。第二部分則是概述文雅文化的實質內容以及學界之研究成果。第三部分探討交談在文雅文化中的重要性，無論是笛福、阿迪生或是沙夫茨伯里都認為唯有能夠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方能夠培養出個人之文雅。第四部分是指出商業對於交談以及文雅的蓬勃發展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力，而笛福對這方面的著重高於其他作家，這又與其所設定的目標讀者有密切關係。本文強調笛福對交談的社會性意義與重要性之重視，論證笛福在英格蘭社會在內化文明禮貌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關鍵詞：丹尼爾·笛福、文雅文化、商業社會、《觀察者》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一、前言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3)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的重要作家，他的《魯賓遜漂流記》(*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被不少學者視為是最早的英文小說之一。¹此外，他也主持過許多雜誌與報紙，其中最著名的為《評論》(*The Review*)，以每週兩期至三期，兩大張紙的形式來評論時事，這份刊物共連載了十年，也因此也有不少學者稱其為「現代新聞之父」。笛福的著作汗

¹ 例如，Margaret Drabble, Jenny Stringer, and Daniel Hahn, "Defoe, Daniel," in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214921.001.0001/acref-9780199214921-e-1642>, accessed June 24, 2019; Leopold Damrosch, *God's Plot & Man's Stories: Studies in the Fictional Imagination from Milton to Fie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187; Pat Rogers, *Robinson Crusoe, Unwin Critical Libra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9), 1. 目前學界關於笛福生平最完整的傳記請見 Maximilian E. Novak, *Daniel Defoe: Master of Fictions: His Life and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hn J. Richetti, *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中文世界中對於笛福的研究論文多以其小說作品為主，其中少數有碰觸到笛福的政治經濟評論，以及他與十八世紀世界關係的研究，請參考劉禾著，叢郁譯，〈燃燒鏡底下的真實，笛福、「真瓷」與18世紀以來的跨文化書寫〉，收入李陀、陳燕谷主編，《視界——第十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70-97；李猛，〈魯賓遜的世界〉，收入李猛，《自然社會——自然法與現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1-40；楊璐，〈傳統的變革與個體的重構——魯賓遜的出走、改造與重返〉，《社會》，37：1(上海，2017.1)，頁61-93。笛福非小說著作的中譯本，最完整的應為徐式谷所譯的《笛福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當中收錄了多本笛福具代表性的政經評論小冊子。

牛充棟，即使是目前以最嚴格的標準來核定笛福的研究者，他們的調查成果亦指出可以被確定為笛福的著作，其數量超過了三百本。²稱許笛福是英格蘭從 1688 年革命到喬治一世(George I, 1714-1728 在位)統治年間，最為多產及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並不為過。

笛福出生於倫敦不服從國教徒(the Dissenter)³的家庭，其父親詹姆斯·福(James Foe, 1630-1707)是頗為成功的商人。笛福日後作品多關注英格蘭的商業發展、英格蘭的宗教寬容，以及清教徒的地位等主題，與其成長背景息息相關。青年時期的笛福懷抱著成為牧師的目標，進入了日後擔任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校長的查爾斯·莫頓(Charles Morton, 1627-1698)所創辦的紐因頓格林學院(Newington Green Academy)。不過，笛福在結束學院的訓練後，放棄原先擔任牧師的計畫轉而進入商界。他於 1683 年創辦了公司，從事酒類、女性襪襪和菸草的出口。幾年之後，他亦涉足過麝香貓和燈籠褲的買賣。1685 年他參與了蒙茅斯公爵(Duke of Monmouth, 1649-1685)發動的軍事政變，而當政變失敗，笛福獲得了國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85-1688 在位)之赦免。他從 1690 年代開始發表大量著作，並且在 1703 年，因為一本諷刺英格蘭高教會(the High-Church)壓迫非國教徒

² P. N. Furbank and W. R. Owens,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8).

³ Dissenters 本義為不同意者、反對者，在笛福的時代，這個詞通常則指的是不願意接受英格蘭國教會教義、儀式的基督徒，例如長老會、浸信會和貴格會以及其他數十個大小教派，而其中人數最多的便是長老會，他們在當時也被稱為清教徒。不服從國教徒在英格蘭自亨利八世(Henry VIII, 1509-1547 在位)的宗教改革後便開始存在，不過每個時代這群不服從者在政治社會上的處境不盡相同。與本文時代背景相關的是，雖然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89-1702 在位)與瑪麗二世(Mary II, 1689-1694 在位)在 1689 年核准了《寬容法案》(Act of Toleration)，保障了不服從者的合法權利，並確保他們可以合法地集會禮拜，並且可以成立自己的教育機構等等，但是他們仍被限制不得擔任公職，也不被允許就讀牛津、劍橋大學。

的小冊子，被判處枷鎖示眾。在當時下議院的議長(Speaker of the House of Commons)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 1661-1724)的賞識與營救之下，笛福方得以出獄，也因此開始為哈利效力，擔任其間諜以及政治寫手。笛福於 1704 年開始連載的《評論》這份刊物(每週出刊二至三次)，其中的一個重要目的，便是替哈利宣傳政策，並且在輿論界中批評其他陣營。笛福為現代人所熟知的身分是小說家，不過他是在將近六十歲(1719年)方發表首部小說《魯賓遜漂流記》，其他如《茉爾·弗蘭德斯》(*Moll Flanders*)、《傑克上校》(*Colonel Jack*)等小說，都是在 1720-1722 年之間所創作的。他在人生最後十年寫作了一些至今仍經常被學界討論的作品，如《大不列顛全島遊記》(*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1724-1726)、《英國商人全書》(*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1725-1727)；最終在 1733 年於倫敦近郊躲避債主時因病去世。

笛福的眾多著作中最為學界所重視的為其小說、政經評論以及其對宗教寬容的主張，他的《魯賓遜漂流記》從十八世紀至今仍被廣為閱讀，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愛彌兒》(*Émile*)、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Capital*)都曾從中尋得啟發。⁴但除了這本小說，從十八世紀至二戰前，笛福的思想大多為人忽視。在這段時期，笛福被視為雇傭作家(hack writers)，其論點迎合不同雇主的各種企圖而變化，其思想缺乏一致性與深度，因而不具備研究的價值。直到二戰後，伊恩·瓦茲(Ian Watts, 1917-1999)於 1957 年出版的《小說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ovel*)，方開始嚴肅地看待笛福小說作品中的個人主義、現實主義、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⁵受此啟發，保羅·杭特(J. Paul Hunter)與喬

⁴ Pat Rogers, *Defo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52-53, 166-167.

⁵ Ian Watt,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London:

治·史達(G. A. Starr)開始嚴肅地探究笛福小說中的神學思想，並且根據他對於《聖經》的解釋來深入理解其政治思想。⁶自此之後至今日，關於笛福的政治、經濟與宗教的思想的專著與文章也有豐碩成果。⁷

本文並非側重笛福非小說作品，在近年來所受到的重視，不過整體而言，學界開始正視笛福著作的重要性可歸結幾個主因。第一，因為學者不再過分拘泥於笛福是否為雇傭作家，或笛福在不同著作中的主張是否自相矛盾。正如詹姆斯·哈特利(James E. Hartley)所指出的，笛福並非學者，其目標讀者亦非受過大學教育的讀者，用現代學術標準來評價他的著作意義並不大。此外，他的每一本著作都有其現實動機以及政經脈絡，也因此瞬息萬變的時局中，他的不同小冊子中會有彼此矛盾的主張並不稀奇。⁸哈特利要申言的是：過去學者先入

Chatto & Windus, 1957).

⁶ G. A. Starr, *Defoe &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J. Paul Hunter, *The Reluctant Pilgrim: Defoe's Emblematic Method and Quest for Form in Robinson Cruso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⁷ Manuel Schonhorn, *Defoe's Politics: Parliament, Power, Kingship and "Robinson Crus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omas Keith Meier, *Defoe and the Defense of Commerce* (Victoria, B.C.: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Dep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7); Robert James Merrett, *Daniel Defoe: Contrari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⁸ James E. Hartley, "The Chameleon Daniel Defoe: Public Writing in the Age before Economic Theory," in *Money, Power, and Pri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British Isles*, edited by Charles Ivar McGrath and Christopher J. Fauske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42. 笛福身為雇傭作家替其雇主喉舌的事實並非不重要，詹姆斯·道尼(J. A. Downie)的經典研究，便勾勒出哈利如何同時雇用笛福、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約翰·托蘭(John Toland, 1670-1722)來妝點政府施政，並且攻擊政敵。參見 J. A. Downie, *Robert*

為主地預設笛福具有某種一致思想，例如「重商主義」(馬克西米利安·諾瓦克[Maximilian Novak]語)的笛福，或是「自由貿易」(約翰·摩爾[John Moore]語)的笛福。雙方陣營都可以找出無窮的材料來反駁對方，終究不會達成定論。但是這兩種觀念都不屬於笛福那個時代，若要將其中任何一種戴在笛福頭上，不免有時代錯置之虞。正如馬克·奈茲(Mark Knights)也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英格蘭出版世界中，虛構、矛盾、冒名等現象層出不窮，他認為研究笛福著作時，重點不應擺在笛福在不同作品中的立場是否矛盾，因為這種討論的成果並不理想。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得以關注笛福在其著作中，如何運用證據和論述說服讀者，以及他認為自己該選擇什麼證據來加強說服力。⁹

第二，笛福的喀爾文主義(Calvinism)信仰對其著作的影響力獲得正視。在《魯賓遜漂流記》中的清教色彩獲得學界注意後，笛福的信仰也成為學者研究的焦點，而研究成果指出笛福的清教徒家庭和教育背景，清楚地影響他一生的著述作品。這表現在他對於原罪、預選論、反天主教等面向的關注。第三，則是約翰·波考克(J. G. A. Pocock)研究的啟發。波考克指出，西方政治思想中自尼可洛·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以降，出現了一個重視公民德性(civic virtue)、共和美德的傳統。此傳統從義大利文藝復興以降，深刻影響了英國以及後來美國的政治思想傳統。十七世紀的詹姆士·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便是其中之代表作家，他主張土地、自主、德性是作為政治領袖的關鍵條件。¹⁰而波考克在討論十七、十八世紀之交的財政革命時，注

Harley and the Press :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Age of Swift and Def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⁹ Mark Knigh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Defoe and Swift," *History Compass* 3:1 (January 2005): 1-20.

¹⁰ 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為：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意到笛福對於信貸(credit)飄忽不定性格的理解，並且認為笛福筆下的信貸女士(Lady Credit)，便是對馬基維利筆下命運女神(Fortuna)的承繼與改造。¹¹學界隨之開始注意到笛福作品中的公民德性、商業社會興起等面向。例如勞倫斯·迪奇(Laurence Dickey)受波考克的啟發，將笛福在1706-1707年英格蘭、蘇格蘭兩王國聯合的相關著作中，對於商業社會的推崇，以及其將商業以及公民德性寬容等價值的提倡，放入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 1583-1645)與賽繆爾·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 1632-1694)的自然法傳統之中來探討。

最後，也是與本文最為相關之處，是關於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的文雅(politeness)的討論。¹²這個研究同樣深受波考克的研究所啟發。波氏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中，提出文雅於十七世紀中葉成形、十八世紀初成熟的論點，而且文雅擴大、拓廣了德行在過去的相對嚴格與狹隘定義，從而改變了共和主義以及其信徒的思維，進而讓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更適應現代世界。¹³又，波考克指出文雅文化的重要性，在於文雅是英格蘭文人為了因應商業社會所引發之各種議題(如動產與不動產、農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¹¹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99.

¹² Politeness 有許多翻譯方式，本文跟隨目前學界之慣例，以文雅文化或以文雅稱之。參見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士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臺北，2012.12)，頁799；陳正國，〈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臺大文史哲學報》，76(臺北，2012.5)，頁283。中文學界關於十八世紀英格蘭文雅文化最詳細的討論為：許奕辰，〈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1659-171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¹³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423-505.

業與商業如何調和的一種答案。諸如喬瑟夫·阿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理查·史蒂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乃至於稍晚的蘇格蘭思想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在他們著作中對文雅文化的鼓吹，其實同時也是在與信奉共和主義德性觀的新哈林頓主義者(neo-Harringtonians)¹⁴，像是斯威夫特、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第一代博林布魯克子爵(Henry S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 1678-1751)等人進行論戰，爭辯商業價值對於德性究竟是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¹⁵文雅在阿迪生等人的解釋下是具德性的親社會性(virtuous sociability)的一種形式，它能夠在日益商業化的時代，保留著古典共和主義的精神。而斯威夫特

¹⁴ 此名稱為波考克首先使用，在波氏的分析中，新哈林頓主義者從十七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開始出現。這群人受哈林頓著作之啟發，崇尚自古代英格蘭傳承下來的德性，並且相信這種德性要依賴民兵與地主菁英階層的保護與維持，而後者的自身利益由於與國家緊密相連，這也確保了他們在政治上以及執法上會深思熟慮。這群人大多是托瑞派，相信要擁有實質財產(例如土地)，方能確保在政治上的擁有自主權力。他們對於商業以及其衍伸的金融工具(例如炒股)抱有敵意，認為這些威脅到了政治穩定與道德。波考克之所以稱其為「新」，是因為這群人並未全盤接受哈林頓的思想，像是哈林頓為了維護共和國所構思的政治方案在光榮革命之後尤其顯得不合時宜，又如哈林頓不喜封建制度，而新哈林頓主義者卻強調存在於英格蘭封建時代的古憲法傳統。不過，後者仍服膺於哈氏關於土地所有權與政治權力之等式的這個論點。見 J. G. A. Pocock,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104-147;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especially chapters 12, 13 and 14. 有關波考克研究論點之介紹，請見 Kenneth Sheppard, "J. G. A. Pocock 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 in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113-125.

¹⁵ Isaac Kramnick,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等人則對商業社會之價值感到懷疑，並且認為文雅與德性並非如阿迪生等輝格派所說的彼此相輔相成。¹⁶

在波考克開創性的研究之後，新一代學者開始投入此領域鑽研，他們之中的一個共識，是在十八世紀初的英格蘭出現了文雅這個新觀念。此觀念取代了舊的公民德性觀念，並在成為後來啟蒙時代關於文雅的主流說法。這些學者，如波考克的學生勞倫斯·克萊因(Laurence Klein)除了其博士論文所改寫的研究沙夫茨伯里第三代伯爵安東尼·阿什利·庫柏(Anthony Ashley Cooper, 3rd Earl of Shaftesbury, 1671-1713)的專著以外，也針對阿迪生和史蒂爾，以及十七、十八世紀英格蘭咖啡館文化，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¹⁷此外，尼可拉斯·菲利浦森(Nicholas Phillipson, 1937-2018)的一系列論文，有力地論述了十八世紀早期英格蘭社會文雅文化的發展及其在各方面的影響力。他指出阿迪生等人所著的《閒談者》(*The Tatler*)、《觀察者》(*The Spectator*)等期刊，探討道德、品味和宗教的大量文章，對城市的文化結構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分析。阿迪生等人在他們的文章中展示出城鎮居民可以透過完善、精鍊日常對話，來改善自己的言行舉止與道德。¹⁸在克萊因與菲利浦森的開創之下，目前關於此時期的

¹⁶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235.

¹⁷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Lawrence E. Klein, "Joseph Addison's Whiggism," in *"Cultures of Whiggism": New Essays o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Paddy Bullard, David Womersley, and Abigail Williams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108-126; Lawrence E. Klein, "Property and Politenes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Whig Moralists: The Case of *The Spectator*," in *Early Moder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edited by John Brewer and Susan Staves (London: Routledge, 1995), 221-233.

¹⁸ Nicholas T. Phillipson,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David Hume and the

文雅文化之研究已經有豐碩成果。

笛福與上述這些作家身處於同一個時代，而且阿迪生和史蒂爾的《閒談者》、《觀察者》與笛福的《評論》在發行時間上有數年重疊；笛福對於商業以及阿迪生等人所推崇的咖啡館文化，亦發表過許多議論，也因此文雅文化的研究中，簡短地提及笛福的作品也不在少數。然而，至今尚未有文章深入地探討笛福與文雅文化之間的關係，本文將對這點進一步的申論。

菲利浦森曾指出，從十八世紀上半葉英格蘭幾位重要文人的作品中，可以觀察到出談話(conversation)、商業與文雅文化這三者之間具有密切之聯繫，而笛福正是這幾位重要文人當中的一員。菲氏指出，笛福堅信語言具有改變人類作為的力量，因此他創作諷喻作品和政治評論的目的，旨在激起讀者的辯論。人們受到他這樣的刺激後開始與他人爭辯，也唯有如此方能從中看清本身所持觀點之侷限，以及對於自己以及其他而言，最理想的公共利益為何。¹⁹筆者認同菲氏對笛福重視語言力量的判斷，不過菲氏的著作絕大篇幅集中討論阿迪生與休姆，笛福似乎是文雅文化的局外人。本文則將指出，笛福終其一生皆關注對話和文雅文化，從早期至晚期的作品中皆對此有所發揮。此外，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Nicholas T. Phillipson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02-320; Nicholas T. Phillipson, “Politics and Politeness in the Reigns of Anne and the Early Hanoverians,” in *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1800*, edited by J. G. A. Pocock, Gordon J. Schochet, and Lois Schwoer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1-245; Nicholas T. Phillipson, “Politics, Politeness and the Anglicisation of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Scottish Culture,”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ited by Roger A. Mason (Edinburgh: J. Donald, 1987), 226-246.

¹⁹ Nicholas T. Phillipson,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307.

本文更加細緻化了文雅文化的概念，指出所謂阿迪生式文雅(Addisonian politeness)乃為鄉紳階層的文雅理論，笛福則是瞄準了商人階層以及其他大致屬於下中產階級(the lower middle class)的人士為目標讀者，宣揚更能為這群人所能接受的文雅觀念。換句話說，就是將文雅擴及商人階級與閱讀小報的群眾。

同樣是波考克學生的凱薩琳·克拉克(Katherine Clark)於 2007 年出版笛福的思想傳記，是目前少數關於笛福的思想史專著。書中點出笛福與文雅文化之間的關係。克拉克指出，笛福對於改善人們談話的內容十分關心，並且提出相關計畫，如設立語言學院以及教授語言課程的女子學院。由於，文雅文化的核心關懷之一是改善人類談話時的水準，因此克拉克視笛福也是推動文雅文化之作家。²⁰不同於克拉克僅以笛福的單獨一本著作來展開討論，本文將笛福早期至晚期的眾多作品皆納入討論，論證文雅文化是笛福寫作生涯中始終關心的面向。此外，克拉克是從女性教育或是糾正粗口的角度來看待笛福的文雅觀，本文與克拉克所論有所差異。本文所申論的重點是，笛福對於文雅文化的關注，不僅在於得當的談吐，同時他也同樣主張商業背後所蘊含的自由、寬容、文明等價值。也就是說，商業與文雅文化乃至於社會整體的福祉，都是相輔相成的。要言之，雖然笛福替商業以及其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的辯護已受到學者注意，不過笛福在其著作中亦對於商業對於風俗、人類的社交以及文雅文化所帶來的影響有不少發揮，然而笛福與文雅文化之間的關係至今仍尚未有完整的相關研究，因此本文以下將就此深入討論。

²⁰ Katherine Clark, *Daniel Defo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Time, and Provide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 21.

二、文雅文化

今日人們看到文雅一詞，首先會聯想到的是有助於緩和社會關係的一套行為習慣。根據《牛津英文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文雅文化兼具如優良品味(*good taste*)、優雅、禮儀(*courtesy*)、重視禮節(*good manners*)這些意思。²¹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文雅文化牽涉到的範圍更加廣泛。它除了牽涉到人與人之間在社會中的言行舉止，也被視為是促進社會完善與進步的手段。此外，文雅文化滲透到十八世紀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當時作家創作所謂的文雅文學(*polite literature*)、畫家、雕刻家創作「文雅藝術」(*polite arts*)，市民們則是結伴參加文雅聚會。²²

文雅文化一詞，既是十八世紀作家也是現代研究者為了方便統稱所使用的名稱，其實十八世紀的著作中還有許多詞語，雖然出自不同的時空脈絡，不過大體上都會跟文雅一詞同時出現，像是禮儀、教養(*good breeding*)、禮貌(*civility*)、親社會的(*sociable*)以及彬彬有禮(*mannerly*)等，這些詞語被廣泛地用於當時英國作家對社會與文化的討論當中。克萊因便以主隱喻(*master metaphor*)的說法，來描述文雅文化一詞的概括性意涵。²³文雅文化便是一個類似最大公因數的概念，根據學者歸納，文雅文化的具體行為與表現，大抵有三個原則。首先是謙遜並且不會冒犯他人的言行舉止；

²¹ "Politeness,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019, www.oed.com/view/Entry/146882, accessed May 12, 2019.

²²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7), 90.

²³ Lawrence E. Klein,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3 (September 1989): 588.

其次是舉止優雅彬彬有禮；第三則是對於朋友同伴慷慨大度。²⁴

文雅文化之所以於十七世紀末的英格蘭興起，有其背景存在。過去的禮貌與禮儀與當時的宮廷有密切關聯，實踐禮貌與禮儀的人多半為貴族或在宮廷中活動的上層人士。相對地，文雅則是與城鎮關係密切。²⁵宮廷文化的影響力隨著商業城鎮的興起，於十七世紀後期緩次下降，而且宮廷對於行為的語言的講究也被英格蘭的鄉紳階級所模仿，並且被帶入以中間階層(the middling sort)²⁶為主要參與者的文雅文化之中。²⁷克萊因指出，十七世紀中葉以降，尤其是 1688 年革命之後，

²⁴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1.

²⁵ R. H. Sweet, "Topographies of Polite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355-374.

²⁶ 從十七世紀中葉開始，由於殖民、貿易的持續擴張，英格蘭社會中的「中間階層」隨之崛起。他們的成員多為商人、不過也包括像是專業人士(律師、神職人員)等其他群體。從十七世紀末到十八世紀中葉的文獻中，可以看到介於鄉紳與農民之間的中間階層快速興起。他們能夠負擔得起而且可望享受舒適、華奢的生活風格。參見：Peter Earle, "The Middling Sort in London," in *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 edited by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UK, 1994), 141-158; Keith Wrightson, "Esta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ited by Penelope J. Co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0-52; Keith Wrightson,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2), 2-43. 十七世紀末由約翰·鄧頓(John Dunton, 1659-1733)所編輯的期刊《雅典莫丘裡》(*Athenian Mercury*)自 1691 連載至 1697 年，在形式與內容上都被視為笛福與阿迪生等人的靈感來源。而根據海倫·貝瑞(Helen Berry)研究，這類刊物的核心讀者幾乎都是中間階層。見 Helen Berry, *Gender, Society and Print Culture in Late-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 of the Athenian Mercury* (Aldershot: Ashgate, 2003), 23.

²⁷ Lawrence E. Klein,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

英格蘭城鎮的工商業加速發展，鄉村人口也隨之往城鎮遷移。此一背景既創造出對於文雅這個新文化典範的需求，也造就了此典範茁壯的環境。²⁸其他的因素還包括了英格蘭商業在經歷十七世紀末所謂「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後所發生的擴張；²⁹《出版許可法》(Licensing Act)於 1695 年逾期之後，未再受到國會的批准展延，該法等同遭到廢除。因此，英格蘭政府無權再審查出版品，這讓出版的期刊數量如兩後春筍般增長。這時候許多期刊內容並不是新聞報導，而主要是不同作者針對廣泛議題的論說文。阿迪生與史蒂爾推廣文雅文化的刊物，在這種較過去寬鬆且活潑許多的文化下而蓬勃發展，他們利用出版品傳達他們對於政治、社會的看法，並且與讀者交流，這種影響力也讓期刊物的流通量迅速提升。³⁰

Century England,” 585. 在十八世紀早期，文雅禮貌的理想得到了廣泛的傳播，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中產階級的克制的德性與貴族之墮落和缺乏教養。見 Michael J. Braddick, “Civility and Authority,”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edited by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96.

²⁸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11.

²⁹ 這個革命的關鍵是信貸流通能力的擴大。與此相結合的是銀行業的發展，最終在 1696 年英格蘭銀行成立達到頂峰，其他發展還有公共信貸體系、股票市場制度的引入是向現代金融體系過渡的重要標誌。在這種「公共信貸」體系中，各種各樣的個人將資金借給國家，以期得到他們所投資金額的保證回報。這使得政府在準備對歐洲大陸發動戰爭時，能夠維持不斷擴張的官僚體系和更安全的常備軍與皇家海軍。見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G. M. Dicks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Macmillan, 1967).

³⁰ Lawrence E. Klein, “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9:1 (January 1997): 44-50.

根據柯蘭一系列的著作指出，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哲學著作替文雅文化樹立起理論基礎，他將此文化背後蘊含的價值觀深化為富哲思性的文字。伯爵企圖扭轉復辟時代(The Restoration, 1660-1688)以來英國宮廷腐敗所造成的言語空洞，行為充滿矯飾等種種問題。沙夫茨伯里的著作希望紳士們培養自身修養，能夠過著富有理性以及文明的文雅生活。他所指出的具體的作法是：鼓勵人與人之間在輕浮的社交以及沉重的對話這兩端中間達成理想的對話。³¹阿迪生和史蒂爾在《閒談者》(*The Tatler*, 1709-1710)與《觀察者》(*The Spectator*, 1711-1714)³²等刊物對文雅文化的鼓吹，並且用對話、寓言的方式，將沙夫茨伯里的深奧文字轉化為相對淺白的文字幫助讀者理解。他們也將對道德的追求與落實與日常生活的點滴聯繫起來，使得道德改善行動更為貼近讀者之生活經驗，藉此讓道德觀念變得更為親民，有利於市民的實踐。阿迪生說，若是無法將道德與日常生活聯繫起來，一個人的作為無法依循正當方向，宛如在海上漂流的失錨船隻。阿迪生等人相信德性的獲致，是從日常生活中堅持溫和(moderation)、公正與謹慎等價值觀點滴累積起來的。³³

《觀察者》認為政治自由、商業與文雅文化三者密不可分。商業的發展有助於文雅的精進，而且華奢(luxury)之發展或商業之擴張，雖然偶而會對社會帶來負面影響，但是比起其所帶來的優點可說是瑕不掩瑜。³⁴《觀察者》認為商業所帶來的改變及其價值，已是不可抗拒的

³¹ Lawrence E. Klein,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100-101.

³² 《閒談者》的作者主要為史蒂爾，阿迪生則是部分期數的作者，而《觀察者》的作家群眾多，不過最主要的作者則是史蒂爾與阿迪生兩人(兩人各自發表的期數不相上下)。

³³ Nicholas T. Phillipson, *David Hume: The Philosopher as Historia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25.

³⁴ 在 1688 年之後，輝格黨當中也有另一群人認為商業與禮儀之間彼此對立，

趨勢。十七世紀中葉以降在英格蘭逐漸具影響力的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t)下的德性觀念,³⁵並不會阻礙對於文雅文化的追求,因為阿迪生等人扭轉了商業會阻礙公共利益,或是傷害個人德性的說法。相反地,他們強調貨真價實的文雅,不是過去被批判的錦衣華食和矯揉做作,而是一種樸實無華的態度:每個人應努力讓自己的日常作為符合理性、宗教虔誠。再者,這種文雅與整個社會、國家的利益乃彼此相

不過本文所討論的沙夫茨伯里、阿迪生、笛福雖然對於商業與禮儀之間的密切程度有不同看法,但三人都不認為兩者是相互衝突的。詳細的討論見 Markku Peltonen, "Politeness and Whiggism, 1688-1732," *Historical Journal* 48:2 (June 2005): 391-414. 而關於文雅文化的概論作品著作,目前最好的作品為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 ³⁵ 波考克指出,文藝復興時期以馬基維利為代表的公民人文主義,在十七世紀中葉英格蘭因為哈林頓以及稍晚的阿爾格農·西德尼(Algernon Sidney, 1623-1683)的引介,開始在英格蘭思想界當中扎根,到了十八世紀初期時已經具有相當重要性。大抵而言,在此公民人文主義傳統中,德性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整個社會的道德與物質之根本。換句話說,德性的定義是:一個人如何認識以及管理自己,並且知道自己在社會結構中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人必須要努力克制自我,不讓德性墮落。此外,公民人文主義有幾個特質:首先,它所推崇的公德性是一種特定的男性德性,以男性戰士公民為代表;其次,它是種貴族式的德性,公德性是建立在土地所有者的性格上的,也就是擁有私人收入的立法者。第三,根據羅馬衰亡的歷史,這些人文主義者對於商業、信貸制度、海外殖民抱持高度懷疑。最後,公民人文主義是種歷史思維模式,它將商業的發展和隨之而來的社會成員的腐敗視為不可避免的、週期性的女性化衰落的一部分,因此像是達文南特、湯瑪斯·戈登(Thomas Gordon, 1691-1750)這些人文主義者主張人若要培養個人德性以及維護公共利益,必須要擁有土地,如此方能在經濟上維持獨立,並且有餘暇與經濟條件擔任民兵,也才能夠抵抗商業、華奢等等污染。他們認為,基於對奢侈品的渴望而進行的商業擴張是對國家德性的敗壞。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432-435, 446, 458-459.

輔相成，文雅無論是對個人或是公共皆有助益。³⁶

阿迪生指出，雖然他的文字「取悅與娛樂」了人們的想像力、成為對話的談資，因而獲得意想不到的成功，不過他更重視的目標在於使讀者明白；對他而言，「唯有一種對公共有益的生活，才是真正地在活著……我必須要在文章中闡述上述說法的智慧以及悠久歷史，亦即，人若對公共福祉沒有貢獻，實際上與死人無異。」³⁷在符合理性與虔誠部分，阿迪生在《觀察者》第四百六十七期中寫道，他的讀者們追求的理想文化可以讓自己：

談吐中的嚴肅成分，能夠因為機智與幽默而變得生動活潑，而且談話中的歡樂也總是同時帶有教育意義，而且多少能令聽者愉快。因此，在理想的文雅之士身上，歡欣不必然要以欠缺理性作為代價，也不會因為性情中的嚴肅而失去歡欣心情……只要讓他可按照自己的性情行事，那麼他總是溫柔謙和的；一旦要為君主、國家……效力時，他永遠都會全力以赴而且堅定不移。³⁸

在文雅與商業方面，雖然馬庫·佩托能(Markku Peltonen)指出在《觀察者》中看不出「文雅是商人的獨有特徵，或者是說文雅是因為商業所產生的。」³⁹但是在這個提倡文雅文化的具影響力刊物中，有許多期數皆在告訴讀者，商業對於公共利益有益，並且對於個人德性無損。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阿迪生雖然不用文雅來稱讚商人，但是他與笛福

³⁶ Markku Peltonen, *The Due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Hon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56.

³⁷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edited by Donald F. Bond, vol. 2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94.

³⁸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edited by Donald F. Bond, vol. 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153-154.

³⁹ Markku Peltonen, "Politeness and Whiggism, 1688-1732," 409.

是十八世紀初英格蘭為數不多對於商人高度讚揚的作家。阿氏讚揚商人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文雅人士所享受品味的文化很多都是他們帶到倫敦來的，他們讓世界各地的人們與文化匯集在倫敦。⁴⁰例如阿迪生在《觀察者》第一百八期中，記錄下了一位老鄉紳大費周章地捕捉野禽，並且在餐桌上詳述究竟如何料理這些動物。故事中的主角便感嘆：

這麼一顆善良的心、如此忙碌的雙手卻完全用在這些瑣事上面，這麼多的慈愛卻對他人毫無幫助，那麼多的勤奮卻對自己毫無益處……一個貿易商或是商人，儘管能力平庸，卻可以比這個老紳士對他的國家以及自己有更多正面幫助。⁴¹

此外，在阿迪生著名的關於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的描述中，指出當中的商人造就了國家繁榮與世間福祉，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增加私人、家庭財富的同時，也促進了國家利益。他們：

將人們團結在一塊，並且讓他們有次序條理地互動，並且在此分發大自然給人類的贈與，給予窮人工作、為富人增加財富、替偉人增添光輝。⁴²

因此，在文雅社會中，固然商人與中上階層菁英並非屬於同一群體，但是阿迪生與史蒂爾等作家皆同意商人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也是維持此文雅文化的關鍵群體。

⁴⁰ A. R. Humphreys, "Addison, Steele, and the Periodical Essay," in *A Liter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 The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1660-1789), edited by George Sherburn and Donald F. Bond,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7), 878.

⁴¹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448.

⁴²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296. 參見 M. M. Goldsmith,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30-131.

三、風俗改革、交談與文雅

綜上所述，目前學界普遍同意交談和商業所帶來的正面成果，是十八世紀初英格蘭文雅文化的兩個重點。以下將以這兩點為線索，展開對笛福與此文雅文化之關係的探討。如上所述，菲利普森曾簡短地提及，在笛福的作品中交談、商業與文雅之間關係密切；菲氏指出，笛福堅信語言具有改變人類舉止的力量，例如他的諷刺著作或政論的目標，便在於希望激起讀者之間的辯論，從對話中看清楚自身觀點之侷限所在，以及對於群體而言最為理想的公共利益為何。⁴³本文則是更進一步指出，笛福對於語言的重視尤其表現在他對「交談」的再三著墨。而這個想法的背景以及重要性，則必須要放在笛福對於新興之商業社會的觀察與理解上頭。本文首先簡述光榮革命後風俗改革的背景，接著以笛福不同著作中的實例，來說明他如何在商業與文雅文化的脈絡中，闡述語言和對話之重要性，以及社會交際與文雅之相輔相成。最後部分則是將上述笛福的論點，放到目前文雅文化之學界既有成果(主要針對阿迪生與史蒂爾)中討論，藉此刻劃出笛福與《觀察者》針對文雅文化在概念上的區隔，以及本文對於既有研究之突破。

光榮革命結束後十數年間，英格蘭社會陷入普遍性的道德恐慌。此時代的許多人把罪惡的橫行，視為對光榮革命新建立之政府的威脅，並害怕上帝對於英格蘭全國施以懲罰。1690年代的英格蘭在這種普遍的道德焦慮氣氛中，出現了一場風俗改革運動(Reformation of Manner)。這樣的運動起源於英格蘭國教會在復辟時代對於「褻瀆和不道德」行為的譴

⁴³ Nicholas T. Phillipson, "Politics and Politeness in the Reigns of Anne and the Early Hanoverians," 223-224.

責，不過此運動實際地在倫敦茁壯，以及開始擴散到英格蘭地方各郡，仍要等到 1690 年代。輝格派有不少議員直接參與或是支持風俗改革團體，而且在國會中提出或支持推動風俗改善的法案。⁴⁴其中最重要的團體是遍佈各地的「風俗改良協會」(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⁴⁵風俗改良運動與光榮革命最相關之處，是女王瑪麗二世對此的關心與鼓吹。1691 年女王親自寫信給米德爾塞克斯(Middlesex)的官員，鼓勵他們更認真地執行現行法律以改良風俗。改良協會在各地的分會，由許多國教會的平信徒所組成，他們致力於抑制賣淫以及諸如酗酒、瀆神等惡行。

⁴⁴ David Hayton, "Moral Reform and Country Politics in the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Past & Present* 128:1 (August 1990): 48-91. 杜德利·巴曼(Dudley W. R. Bahlman, 1923-2000)在其經典著作中提出光榮革命同時是場道德革命(moral revolution)的看法。光榮革命結合了鼓吹行事合乎道德規範以及鼓吹敬虔的運動，這反映出輝格黨所承繼的十七世紀中葉清教徒傳統。在 1670 年代和 1680 年代，西德尼和亨利·內維爾(Henry Neville, 1620-1694)重塑了共和主義，並以憲政、有限政府的名義反對宮廷的專制主義。1688 年的光榮革命可以說是輝格意識形態中共和主義和抵抗理論的例證。而在革命成功之後，輝格黨中的成員清楚地希望光榮革命能帶來公民和個人的德性。他們在革命之後不久便寫文呼籲當前政權在改革國家腐敗方面做得不夠。見 Dudley W. R. Bahlman, *The Moral Revolution of 168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M. M. Goldsmith, "Liberty, Virtue, and the Rule of Law, 1689-1770," in *Republicanism, Libert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1649-1776*, edited by David Woott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03.

⁴⁵ 首先成立的一個協會位於倫敦附近的陶爾哈姆(Tower-Hamlets)，因為這個地區尤其以酗酒和賣淫惡名昭彰，所以是改良風俗的一個理想示範場所。主持這個分會的人是愛德華·史蒂芬斯(Edward Stephens, 1636-1706)，他主張這個社團將可以實現自一百多年前英格蘭宗教改革以降，長期存在卻成效不彰的理想。雖然史蒂芬斯的行動源於他對國教會的不滿，不過國教會的一些領袖像是如愛德華·斯蒂林弗里特主教(Edward Stillingfleet, 1635-1699)認同他的作法，並且將其想法傳達給瑪麗女王。

雖然在復辟時代有類似的呼籲，但是光榮革命後，地方官員的大規模投入，以及與不服從國教者(協會在 1694 年開始接受他們加入)之合作，則標誌著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⁴⁶《觀察者》中對於文雅的提倡，亦可視為對於當代正在進行的風俗改良運動之一部分，將提倡文雅與鼓勵公眾精神與風俗改良結合在一塊。⁴⁷《觀察者》追求人際互動、日常交談中的文雅，並且批評放蕩不羈的行為和暴力決鬥等等，這些都與改良運動的目

⁴⁶ 威廉與瑪麗十分鼓勵協會的作為，他們在 1692、1698、1699、1702、1703 年都頒布皇家宣言給協會(royal proclamations)作為官方鼓勵的證明。到了 1701 年，倫敦大約有 20 個分會，而在英格蘭各個地方至少有 42 個，而在愛丁堡有 13 個。他們計畫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開會，集中精力解決酗酒，咒罵和其他犯罪行為，並且有每年選舉出其中行政人員的安排。他們為了找出犯罪者建立了一個告密者網絡，而且他們有著上頭早已有許可證明的逮捕令，他們可以填上罪行以及地點直接交給地方官員。這些分會積極追捕醉漢、妓女、在星期日做生意的人、賭徒和褻瀆神明的人。在四十五年的時間當中，一共起訴了一萬多名市民。以上背景介紹主要參考自：Dudley W. R. Bahlman, *The Moral Revolution of 1688*; Shelley Burt,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Between John Locke and the Devil in Augustan England," in *The Margins of Orthodoxy: Heterodox Writing and Cultural Response, 1660-1750*, edited by Roger D. Lu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9-169; Andrew G. Craig, "The Movement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88-171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80); R. B. Shoemaker, "Reforming the City: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Campaign in London, 1690-1738," in *Stilling the Grumbling Hive: The Respons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England, 1689-1750*, edited by Lee Davison et 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99-120; Tony Claydon, *William III and the Godly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raig Rose, "Providence, Protestant Union and Godly Reformation in the 1690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 (1993): 151-169.

⁴⁷ M. M. Goldsmith, "Liberty, Virtue, and the Rule of Law, 1689-1770," 208-209.

標相互一致，戮力於改善社會風氣，並打造理想的城市生活。⁴⁸

笛福的《評論》寫作時間，略早於《觀察者》十年。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閒談者》與《觀察者》在主題上、專欄形式上，受到《評論》的影響，不過論者尚未注意到《評論》在文雅文化上，亦是先行者之一。笛福採取的寫作風格以及人際關係，也與上述《觀察者》式文雅相近，都推崇沈著、實事求是、不鋪張等等價值觀。⁴⁹交談、對話在此時代文雅文化的討論，占據著中心位置；而風俗改善運動中對於人們交談的願景，同樣著重人們的談話應該言之有物、不應該褻瀆上帝或是口出污穢的粗話。⁵⁰他認為談話是：

人類生命中最光明和最美麗的部分……這是人類之所以與無生命世界有所區別之處，也是人類彼此之間能夠相互區別之原因……我認為理性生活的特點之一便在於：人類是能夠進行交談的生物，而一個人若是身邊有合適的夥伴可以交談，實在是他一生最大的福氣。⁵¹

此外，笛福在其著作中鼓吹溫和(moderation)的對話型態，亦即進行談話

⁴⁸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24-25.

⁴⁹ Brian Cowan, "Daniel Defoe's *Review*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nglish Periodical,"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7:1 (Spring 2014): 100.

⁵⁰ 有關風俗改良協會這個組織的成立經過以及組織細節，見 Tony C. Curtis and William A. Speck,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Case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Refor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3 (March 1976): 45-64; Shelley Burt,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Between John Locke and the Devil in Augustan England," 149-169; Andrew G. Craig, "The Movement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88-1715."

⁵¹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in *The Novel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G. A. Starr, vol. 3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102.

時尊重他人的判斷，並且避免造成對方的不愉快。這與阿迪生的文雅價值觀亦若合符節。⁵²

從笛福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相當清楚文雅文化在當時的發展以及其所蘊含的正面價值。他認為文雅是人類應該追尋的理想狀態，他認為：

對於一個人最高的禮讚、讓一個人變得更旁人愉快的一種說法便是……他是一個好的同伴(good company)。看到這樣的人將會是令人愉快的，他臉上總是帶著笑容……他的表情總是帶得令人愉悅的氛圍，他總是要讓別人以及自己都感到愉快(agreeable)。⁵³

笛福也時常將文雅文化視為加強自己文章論述的工具。例如，當他在《評論》中與另一份刊物《觀察者》(*The Observer*)針對威廉三世的身後功過筆戰時，《觀察者》欲藉由嘲笑評論先生(笛福在《評論》中的自稱)不懂拉丁文法來貶低其說法之可信度時，笛福便反駁道，像他這樣文雅的人，面對這種批評不會隨之起舞，而是會用看似寬宏大量的超然態度來回覆。笛福寫道：「我對他彬彬有禮(civilly)像個紳士一樣，就像我對其他人所一貫做的那樣；我沒有對他說任何一句壞話……」笛福強調《觀察者》卻用粗鄙語言(scurrilous Language)、以及如市場魚販般的粗俗語言(Billingsgate Language)來答覆自己的「禮貌」。⁵⁴他在另一期《評論》

⁵² Nicholas T. Phillipson,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309; Philip Carter,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24-25.

⁵³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02.

⁵⁴ Daniel Defoe, *Review*,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752. 笛福在 1704 年的《評論》中談及，「一個真正有教養的紳士是絕對不會犯下使用粗鄙語言的錯誤。」見 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1, 589.

問道，一個人雖然拉丁文流利，但是他的「舉止憤世嫉俗、脾氣易怒、在談話中不文雅(Unpolite in Conversation)、說話用詞充滿辱罵與粗鄙，而且控制不住自己的衝動，這樣的人真的稱得上是有學問嗎？」⁵⁵笛福對於自身文雅禮儀之形塑，同樣表現在他聲稱自己為了捍衛威廉三世的光榮歷史，願意去承受惡言惡語(villainous Language)：

我相信任何有理性的的人都不會這樣對待他人……在經歷了這些所有極端行為之後，我毫不在意也不去理會他們的惡意或瘋狂。我根據自己判斷的最佳作法，追求和平的中庸之道，並盡最大的努力親身實踐我督促他人做到的溫和(moderation)之道。人們的污言穢語(scoundrel Language)、凌辱，我都不屑一顧。我感謝上帝的安排讓我可以從事這一路以來的工作，被國家被指派各種工作是我的榮譽……因為我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去拯救各個國家、建立自由、改善貿易以及行善。⁵⁶

由此可看出笛福是如何運用文雅的正面價值，來強化自身立場的合理性，並且藉由指控對手語言無禮來削弱其論述的強度。

笛福在 1690 年至 1710 年之間是風俗改良運動的熱心參與者。⁵⁷笛福認為交談當中的語言，乃是社會風俗具體而微的展現。他觀察到當時英格蘭社會中，普遍充斥著瀆神咒罵等不堪言語。若要提升英格蘭社會的整體素質，勢必先從人們的談話內容著手。他寫道：「改善風俗就是讓日常處世更加嚴謹，也就是要讓對話持重與虔誠……」⁵⁸笛

⁵⁵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7, 521.

⁵⁶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4, 767.

⁵⁷ 笛福在倫敦的時候以及當他受其庇護者哈利之命前往愛丁堡之時都曾經加入當地的風俗改良協會。見 Charles Eaton Burch, "Defoe and the Edinburgh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6:63 (July 1940): 306-312.

⁵⁸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4, 515.

福雖然認同風俗改良的目標，但是他對於實際成果卻頗不滿意。他批判這樣的失敗肇因於指揮運動的領袖人物的私生活極其不檢點，更抨擊這種水準的官員、神職人員居然自認有資格去取締違反規定的中下階層百姓。而他所舉出的例子，同樣是著重在這些人在語言上的墮落。這些牧師本應該是「教會成員之啟迪者，國家之守望人，他們的職業是奉獻給宗教的神聖事業；然而在邪惡的對話中，他們卻是公然瀆神的支持者，罪惡的鼓勵者，每天以褻瀆造物者的言論，作為牧眾最糟糕的示範。」⁵⁹究竟瀆神的具體內容是什麼？笛福所給的例子是，國教會牧師居然同意信眾，可以在表達驚嘆情緒時用「上帝啊！」(By God)⁶⁰一詞，這對於笛福便是徹頭徹尾褻瀆上帝的行為。

笛福認為風俗改良若要真正發揮效果，必須採取上行下效、風行草偃的方式。他相信人性喜歡模仿那些地位、名聲高於自己的人。對於中下階層的民眾而言，他們所欽羨的對象是擁有財富與地位的官員、鄉紳與神職人員。然而，現在英格蘭這些領導階層所給的都是不良示範，不僅使得被取締的百姓無法心服口服，他們以身作則的機會也被徹底浪費。⁶¹笛福對於國教會以及官員的批評，還可以從他對於

⁵⁹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3, 518.

⁶⁰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3, 517.

⁶¹ 笛福在一篇從窮苦人民角度而寫的作品中提到，現在英格蘭的鄉紳與神職人員的錯誤榜樣，把許多英格蘭人推向墮落。因為人們會見到，這些以取締酗酒咒罵而逮捕平民的執法人員，他們自己私下也做同樣甚至是過分的事情，卻完全不需要受罰。這不僅讓這些被取締之人感到不公平，而且他們因為無法心服口服，就算被處罰也不可能真心悔改。笛福指出，唯有當這些上層主事者真心改進，中下層民眾的風俗才有可能真正地被改進。Daniel Defoe, *The Poor Man's Plea* (1698),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 A. Downie,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35-36.

劇院的批評為例來觀察。笛福並不反對戲劇這種表演本身，但是他對於當時在英格蘭所上演的一些嘲諷教會、基督教教義的劇本，則是深惡痛絕。他指出，前往觀賞這些戲劇表演大多是中上階層人士，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當這些領導階層觀看這些演出，被瀆神與淫穢的想法污染後，他們的對話自然會隨之墮落而遠離嚴謹。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會帶給尊崇他們的中下階層民眾不良影響。⁶²

1706 年時，牛津大學為了募款而出借校園場地給予劇團上演戲劇，不過由於上演的劇本中有瀆神的嫌疑，而受到各方的抨擊。其中笛福的作品提出風俗改革與語言之密切關係。他批評學校長官居然允許劇團在大學中，上演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所創作的劇作《西班牙修道士》(*The Spanish Friar*，劇情當中有一位神父仲介他人上妓院)，讓年輕的神職人員腦海裡面充滿了這些不道德的情節、形象，「而且這種劇作透過大學的權威加以介紹的時候，風俗改革的工作怎麼可能繼續下去呢？」他接著說：

這些事情將會使得牧師在智者以及有德者的眼中變得何等卑賤，但是你卻不以為然。唯有當你的神采飛揚之談話匹配得上你所被賦予之偉大使命的時候，你的口舌方能健談，你的職責才能光耀教會。⁶³

笛福接著指出，在牛津大學就讀的學生日後都是要在教會中服務的中流砥柱，這些大學教師是教會的捍衛者，必須要「規範這些學生的對話。」而且他重複上述風行草偃的道理，他說「你們是位於高處的光明，你們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眾人眼中的模範。其他職業的人做起

⁶²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4, 515-516. 另見 *Review*, vol. 1, 625; vol. 3, 487-488; vol. 6, 30, 286.

⁶³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3, 486.

來或許沒有問題的事情，但是對你們神職人員而言這些自由是違反律法的。」⁶⁴在隔一年的《評論》中，笛福一樣指出，教會中的神職人員應該要相互比較誰最有能力通過「嚴格克制的對話」來「遏阻惡行，用他們的榜樣來改革國家，嚴格執行法律對抗普遍墮落之風俗，並且壓制時代的放蕩作為。」⁶⁵

要之，笛福對於當時的風俗協會之實際成績感到頗為失望，然而他一生始終十分關注如何改善英格蘭民眾談話的水準。笛福在 1698 年出版的《計畫論》(*An Essay upon Projects*)當中，曾建議政府應該成立一個語言學院，在這裡教導正確的語言和說話方式。在他看來，對話與禮儀是密切相關的。他說，缺乏水準的對話無疑是一種對禮儀的破壞。在對話中說出粗俗的語言，強迫與談者聽不堪入耳的言語，實在是僭越了禮貌。⁶⁶文雅之士在對話中應該顧及談話對象的感受，不應該在對話中表現出僵硬、陰沈、裝模作樣的矜持，因為以上種種皆會阻礙對話的流暢進行。笛福總結道，一個人是否文雅從他的談吐便可窺見一斑。花花公子(coxcomb)以及紈袴子弟等群體之所以被笛福批評為不文雅，就是因為他們說話空洞而且低俗。笛福指出，這些人錯以為喧嘩就是機智(wit)，誤將滔滔不絕當成是雄辯。⁶⁷這種裝腔作勢的空洞機

⁶⁴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3, 487. 在第六卷中，笛福使用了相同的譬喻：

「令人尊敬的牧師，無論地位尊貴或是卑賤，都是盡力恪遵基督教光榮與神聖職責之人，他們是世上光明之來源，他們對於教義的理解全面周全，在言談上堪為模範(exemplar in Conversation)。」見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6, 467.

⁶⁵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4, 188.

⁶⁶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1687),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8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114.

⁶⁷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7, 272. 阿迪生在《觀察者》第一百十九期也寫

智，污染了城鎮當中的語言，他們這種談吐，在素質上與市井小販之間的粗俗語言(billingsgate language)同樣低劣。⁶⁸

反之，笛福認為正確的對話才能夠讓人的行為舉止變得文雅。他認為言之有物(Exactness of Conversation)與文雅作為兩者存在著良性互補的關係。《計畫論》當中也提出設立女性學院的計畫，從其規劃中也可觀察到適當對話作為文雅文化的一個特徵。⁶⁹瑪麗·雷(Mary Wray, ?-1745)在其 1714 年出版的《女性叢書》(*The Ladies' Library*)中指出女性應該要注意自己的言談，他說「女人的談吐應該像天上仙樂一般甜美迷人，但是不應該大聲到讓遠方的人會聽見。」此外，雷也強調女性應該要注意不應對他人之事說長道短，因為她認為這是女性特別容易犯的毛病。⁷⁰而於下個世代活躍的休姆則指出，文雅的真正特徵之一是「溫

道，城市中花花公子的說話以不理性為特質，他們雖然以為自己是一群機智之士，但是實質上卻像是不入流的小丑。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488. 史蒂爾在同一份刊物的第一百五十一期也寫道花花公子在談話中的表現惡名昭彰。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2, 93.

⁶⁸ Daniel Defoe, *The Dyet of Poland, a Satyr* (1705), in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1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370. 研究者鮮少注意到笛福關於紈袴子弟、談話以及文雅文化之論點，不過克拉克在討論笛福關於超自然的著作時，有提及笛福批評紈袴子弟在談話中為了掩飾其空洞而偽裝出來的飽學姿態，笛福並且認為某些人對紈袴子弟的崇拜將對社會造成危險。Katherine Clark, *Daniel Defo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Time, and Providence*, 200; Daniel Defoe, *A System of Magick* (1727), in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edited by Peter Elmer,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242.

⁶⁹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129.

⁷⁰ [Mary Wray], *The Ladies Library: Written by a Lady*, edited by Richard Steele (London: Jacob Tonson, 1714), 117, 轉引自 Michèle Cohen, *Fashioning Masculin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in the Eighteenth*

和的性情」；⁷¹而笛福也提到，女性在經過學院訓練而具備優良談吐之後，性格也將變得更加溫和甜美。相反的，同樣的一位女性若是沒有去學習文雅行為，那麼她則會變得無禮而聒噪。⁷²

史蒂爾說自己撰寫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要揭穿生活當中的虛假騙術，揭去狡猾、虛榮與矯飾等等偽裝，並且鼓勵吾人在衣著、言談和行為各方面都要保持樸素。」⁷³而笛福也有相同的看法：他對於文雅之士的定義中，其中一個必要條件便是能夠進行「有益且愉快的交談」，而且在對話時其表情必須要和顏悅色，說話的詞語也該避免「矯揉造作」。⁷⁴笛福在《英格蘭商人全書》(*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也寫道：「簡單、樸實、為人熟知的詞語方能展現出語言之美以及寫作之美。」⁷⁵笛福寫道，在政治以及宗教上觀點不同的人，應該要有氣量進行對話；而且這才是社交生活以及紳士風度的精髓：真正的對話是參與的人們都對彼此容忍，並且不急著用自己認同的信條來反駁，而是會寬容那些與自己相左的意見。⁷⁶笛福指出，無論是商人或是從事其他行業的人，都應該在與他人對話中堅持這種態度。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2.

⁷¹ “David Hume to Michael Ramsay, 12. IX 1734,” 轉引自 Mikko Tolonen, *Mandeville and Hume: Anatomists of Civil Society*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3), 196.

⁷²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129.

⁷³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vol. 1, 8.

⁷⁴ Daniel Defoe, *The Commentator* (1720), in *The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9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235-236. 另見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7, 272.

⁷⁵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1725),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52.

⁷⁶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4, 704-705.

四、笛福與史蒂爾、阿迪生之遭遇：語言改善的實際面

《觀察者》的核心訴求之一是談話是消除人的古怪性情以及狂熱(enthusiasm)的最好方法。阿迪生於第十期指出，非貴族的中間階層男女會在茶桌(tea table)⁷⁷、「俱樂部」(clubs)⁷⁸與咖啡館聚會，並且閱讀擺

⁷⁷ 茶桌在十八世紀早期英格蘭的特殊之處在於，這裡是婦女能夠參與社交談話的場所，因為當時女性一般被排斥在咖啡館和俱樂部的討論之外。在某些中上家庭的茶桌之上，是由該家庭中地位最高的女性成員自己(而非傭人)準備茶的，並且會邀請其他人(男女皆有)前來聚會聊天。在此時的詩歌、散文、藝術當中對茶桌概念有所描繪，同時也建構出一個理想化的茶桌形象，而其正與文雅觀念有關。在這樣的理想中，茶桌作為一個自由和公開討論公眾關心的問題場所，由一群男女混合的人來進行，使青年和婦女享有發言權，通過與隨筆、報紙、行為書籍、詩歌、小說和道德哲學等印刷文化的密切接觸來與更廣泛的道德和宗教辯論進行互動。在茶桌上，男女個體聚在一起，進行公開討論，不受等級或地位的影響。由於這些茶桌聚會都是在私人居家中進行，因此無法有確切數字來估計其所在位置以及數量，不過在十八世紀早期的文學和繪畫當中，確實有相當數量的作品呈現出這個女性可以在這個場合中討論政經社會等重要問題。更重要的是，她們是文明有禮地互相辯論，因此成為值得茶桌上其他菁英、男性學習的文雅社交之榜樣。見 Markman Ellis, "The Tea-Table, Women and Gossip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British Sociabili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Valérie Capdeville and Alain Kerhervé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9), 69-88.

⁷⁸ 英格蘭的俱樂部最早出現在十七世紀中葉復辟時代，而在光榮革命之後因為政黨的出現、各類資訊的爆炸、公眾輿論和新公共領域的出現、貿易與消費消閒的擴張等等，都鼓勵著人與人之間的社交互動。1659 年的羅塔俱樂部(Rota Club)是早期具有重要性的代表之一，成員有約翰·奧布里(John Aubrey, 1626-1697)、塞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 1623-1687)及其創始人哈林頓，而其目的則是參與政治生活，他們渴望討論政治，「維護英格蘭的自由。」俱樂部的成員會就報紙、

放於此的報章雜誌，並且就重要議題進行辯論，所以這些地方是學習文雅文化中各式適宜舉止、與提高道德修養的場所。⁷⁹新聞出版品與俱樂部，以及下面要討論的咖啡館之間存在著有機關係，因為它們都具備共同的功能：提高倫敦民眾的政治意識、助長了政治辯論，教育了讀者和會員，從而促成了公眾輿論之誕生。⁸⁰誠如本文首節所述，文雅的重點在於改善「人與人之間在社會中的言行舉止，也被視為是促進社會完善與進步的手段。」文雅文化是俱樂部社交活動的核心，因為俱樂部是練習、實踐文雅行為和社會地位得到認可的理想場所。例如 1731 年成立的皇家哲學家俱樂部(the Club of Royal Philosophers)便以豐

小冊子上的議題進行討論，像是在 1679 年審查制度暫停之後，羅傑·埃斯特蘭奇(Roger L'Estrange, 1616-1704)寫到俱樂部中滿滿都是小冊子，人一不小心就會將書連著派一起吃下去，或者是在點菸草的時候引燃這些書籍。見 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61; Steve Pincus, “‘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7:4 (December 1995): 811; Valérie Capdeville, “Club Sociabi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ble’ Practices,” in *British Sociabili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Valérie Capdeville and Alain Kerhervé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9), 47.

⁷⁹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44. 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則指出，在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初，閱讀大眾的讀寫能力和構成發生了重大變化。男性識字率上升到 60%，女性識字率上升到 40%。受教育程度遠高於窮人，到 1775 年，小店主(shopkeepers)的受教育程度排名第二，達到 95%。儘管書籍很貴，但各種各樣的資源，包括出借書籍的書商、巡迴圖書館、圖書俱樂部、咖啡館都讓書籍變得更容易取得。見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167-197.

⁸⁰ Valérie Capdeville, “Club Sociabi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ble’ Practices,” 50.

富的博學交談聞名。⁸¹又如阿迪生在《觀察者》第九期所寫的，「人們是因為對於交往的熱愛而聚在一塊……享受自己與他人的進步以及福祉，又或者只是為了將自己放鬆於日常繁忙的瑣事之外，這些小型的組織與機構，對於進行一場單純而愉快的對話，確實是有其實用之處。」⁸²根據學者的研究，自 1689 年之後至 1730 年之間所成立的新俱樂部與協會便有將近五百個。⁸³

而在上述場所之中，文人士紳們最常聚會的場所便是咖啡館。大約在 1650 年英格蘭第一家咖啡館於牛津出現，幾年之後倫敦第一家咖啡館也隨之開業，之後咖啡館迅速發展起來，先是在大都市，然後遍及各省。在隨後的幾十年當中，咖啡館成為城市中上階層的男性在工作上與社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場所。⁸⁴當時在證券交易所外的咖啡館，便是股票經紀人撮合交易和交換訊息的重要場所。最早期的咖啡館被稱為「平價大學」(penny universities)，因為這些咖啡館僅會收取微不足道的入場費，而且許多咖啡館會訂閱每週的報紙和期刊，供讀者免費

81 Valérie Capdeville, "Club Sociabi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ble' Practices," 54.

82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42.

83 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132.

84 從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1635-1703)的日記便可以觀察到，1660 年代和 1670 年代，光顧咖啡館便已經是此階層人士的日常習慣。在安妮女王在位期間(1702-1714)，倫敦大約有兩千家咖啡館，到了 1730 年代幾乎倫敦每個角落都至少有家咖啡館，見 Peter Clark,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162. 這個現象同時與十七、十八世紀之交英格蘭商業復興的趨勢密切相關。除了咖啡館本身是一個企業之外，而其所銷售的商品咖啡與茶更與中國以及東方的貿易聯繫在一塊。此外，咖啡館也是商業交易進行的重要場所，其滿足了現代收發室、地方性郵局、會議室、辦公室的功用。Adam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377-378.

閱讀。也因為這種機能，咖啡館與文雅行為在此出現緊密的關連點，亦即人們會特意前來閱讀時事評論，並與其他顧客們討論、爭辯。⁸⁵

根據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說法，從復辟時代開始發展的咖啡館文化，在十八世紀早期達到頂峰。哈貝馬斯認為咖啡館文化的象徵意涵在於其代表一個「公共領域」的出現。報紙、小冊子、咖啡館、政治和社交俱樂部構成了這個領域，人們在其中討論國家事務從而形成公眾輿論。對哈貝馬斯而言，英格蘭咖啡館文化及其定期出版的刊物的發展，標誌著一個潛在的平等主義話語空間的出現，一個更受理性力量支配的領域，而不是現有權力關係的制度性力量。⁸⁶咖啡館文化在《觀察者》等期刊中代表一種有教養的社會精神，人們在其中透過對話的方式來傳遞自由，平等以及克制的價值觀。⁸⁷咖啡館文化的具體文化意涵，便體現出此種理想的社會關係，阿迪生等人也希冀整個

⁸⁵ 當時在證券交易所外的咖啡館，便是股票交易商撮合交易以及交換訊息的重要場所。最早期的咖啡館被稱為「廉價大學」，因為它收取最低的入場費，而且許多咖啡館會訂閱每週的報紙和期刊，這些報紙和期刊是免費提供給顧客的。Helen Berry, "Rethinking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oll King's Coffee Hou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lash Talk': The Alexander Prize Lec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1 (2001): 73-74.

⁸⁶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27-56. 布萊恩·寇文(Brian Cowan)則指出這樣的公共領域固然存在，但是阿迪生等人對於公共事務討論的關心並不如哈貝馬斯想得那麼單純，身為輝格派的他們實際上渴望限縮以及限制這類關於政治問題的公共辯論場所，並且約束公共辯論。Brian William Cowan, "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7:3 (Spring 2004): 345-366.

⁸⁷ Lawrence E. Klein, "Property and Politenes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Whig Moralists," 221-233.

社會風氣能因此改變，體現出各種文明的社會關係。⁸⁸

史蒂爾在《觀察者》第一百四期指出，出於我們對於旁人以及世界的崇敬，我們會注重言行當中的秩序、堅定以及節制，務求得到在交談當中其他人的肯定。⁸⁹阿迪生於《觀察者》第四百六十七期中也指出，在理想的交談之中，當自己作為言說者時，應該要注意言詞內容，特別是不要因為要去取悅對方而犧牲理性；而當自己作為聽者時，應該要彬彬有禮地聆聽他人，人在這個過程中將能得到無與倫比的滿足感。談話雙方在這樣子的理想對話將贏得彼此的尊重，並且對彼此心悅誠服。⁹⁰正如利浦森指出，阿迪生在《觀察者》等作品中鼓吹，人與人之間所進行的對話本身有潛力能夠喚醒人類天生的善心，還可以幫助人在彼此的社交中培養出公共意識和責任感。這是因為他們對於人性抱持正面看法，樂觀地認為人類可以透過社交等作法，來消滅自己的自傲(*pride*)與自愛心。其他反對此種文雅的作家，包括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與斯威夫特，他們並不認為自愛心會像阿迪生所相信的那樣容易就能被消滅，而曼德維爾尤其嘲諷所謂的文雅禮節，只不過是人為了得到他人讚美的裝模作樣，與天生的善心毫無關係。菲氏總結道，斯威夫特等人因為認為人性中的自愛心乃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為對話就有所改變。⁹¹笛福雖然是對於人性不如阿迪生般樂觀，但也不如曼德維爾等人悲觀，此為本節以下處理的問題。

與《觀察者》中鼓吹之價值觀不同，笛福在作品中對於人天生的慈愛心著墨甚少，不過他也不像曼德維爾認為文雅只是出於自利考量

88 許奕辰，〈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1659-1714)〉，頁 83。

89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433.

90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4, 153-154.

91 Nicholas T. Phillipson, "Politics and Politeness in the Reigns of Anne and the Early Hanoverians," 227.

的裝腔作勢。笛福一方面同意人的心中總是以個人利益為最高考量，不過他同時也相信人性是有可塑性的，像是他說父母應該在把握在其兒女年輕的時候，教導他們尊敬長輩、師長，並且彬彬有禮地對待同伴。人性雖然因為原罪而有缺陷，但是在後天努力下，仍然有可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崇高。⁹²

對於成人而言，社交、對話有力量可以將人的自愛心引導到不會傷害其他人的向度。更重要的是，笛福不認為自愛與人類群居生活有所衝突。一群自私自利者也可彼此相安地組成社會，因為他們都知道出於自身利益考量，唯有與其他人共同生活，自己才有可能生存下去，乃至於過著衣食無虞的生活。若是在努力讓自己存活下去的過程中，又可以幫助到其他人，則是錦上添花。在人們之間的日常交流活動之中，不符合《觀察者》所說的那種發自天生善心的情況比比皆是。笛福剖析道，人類社會中許多的日常交流中都充滿了謊言，商人與顧客之間的對話也充滿算計，但是這並未影響雙方在實際生活上的彼此幫助。⁹³倘若要嚴格地規定人與人的對話之間不可以有任何虛偽、私心，那麼商業行為勢必要被全盤拋棄，笛福認為這顯然是不可行的。

例如，《觀察者》第四十九期當中對咖啡館的描繪是高度理想化的城市社交生活。史蒂爾描述了理想的文雅紳士：他們性情溫和，言行舉止當中沒有急躁或不穩定；而且總是在人生當中兼顧到生活的責任和各種人際關係。他們替公共服務盡責卻不圖回報，只希望整個

⁹² Daniel Defoe, *The Protestant Monastery* (1727),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8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251.

⁹³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2 (1727),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8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30, 229-230.

社會向上提升。此外，咖啡館的顧客，被描繪成頭腦清醒、彼此尊重的形象，他們「來到咖啡館不是為了處理公事便是來享受交談。」⁹⁴然而，史蒂爾也清楚並非人們聚會在一塊的社交場合就能夠改善人的氣質，咖啡館當中自然也會出現不文雅的行為。在《觀察者》、《閒談者》中都可以看到作者對不符合文雅理想狀態的記述與批評。《閒談者》作者們在書中的化身比克斯塔夫先生(Mr. Bickerstaff)便針對這些不符合其理想形象的人指責：「擠滿街道、咖啡館、宴會和公共餐桌上的那群烏合之眾，我不承認他們的談話是真正意義上的交談，那些不過是對真正交談的拙劣模仿。」⁹⁵又例如，當時許多打扮時髦的「紈子弟」(fop)⁹⁶，儘管穿著入時並且出入文雅場所，但是口中言論卻都是瀆神與咒罵，這些都有違他理想中的文雅文化，應該要被制止。⁹⁷

⁹⁴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5, 208-211.

⁹⁵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vol. 2, 361.

⁹⁶ 根據《牛津英文詞典》，這個詞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常用意思是「過分注意自己的外表、衣著或舉止的人」，在笛福、阿迪生等人的著作中，經常與花花公子(coxcombs)與好打扮者(beau)等詞一塊並列。這些形象在當時被作者人用來形容在公共場合中，像是咖啡廳或者是宴會中在衣裝及禮儀上頭過分表現鋪張的人。見“Fop,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20, www.oed.com/view/Entry/72746, accessed 24 July, 2020. 這群人多是鄉紳階級中的年輕人，他們的其他稱號包括了「浪子」(rakes)、「型男」(blades)、「好打扮者」(beaus)、「翩翩少年」(sparks)，他們的特徵被認為是喜好炫耀性、輕挑的服裝，喜歡酗酒、暴力以及縱慾(異性之間與同性之間皆有)。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439.

⁹⁷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vol. 3, 119. 這種負面形象與正面形象共存的現象並不是十八世紀初期才出現的，從復辟時代以降，作家們關於咖啡館等場所評價亦是如此，指出不實的謠言總在此流傳，而且污辱咒罵等言語暴力以及肢體暴力也在此盛行等等，見 Mark Knights,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2-254; Brian Cowan,

雖然笛福與《觀察者》作者們都相信，在最理想的狀態下，人們在公開場所進行對話辯論，對於自身的思想深度以及親社會性都能夠有所提升，但是與後者相比，笛福對於咖啡館這個場所，以及咖啡館文化是否具備正面意義與中性價值觀，則明顯抱持著保留態度。例如，他時常批判咖啡館當中充滿許多不堪入耳的言論。當笛福在記述肯特郡的湯布里奇(Tunbridge)時，提到這裡的咖啡館中的男性，對於女性有許多不實的流言蜚語。笛福說他在咖啡館中「更容易聽到這種對名譽的詆毀、對他人事務的干涉、責難、八卦，以及對於清白女性名聲的摧殘。」⁹⁸他也曾提到一位商人在咖啡館一時嘴快開玩笑自己破產了，結果謠言流傳之至整座城市，本來的戲謔之語竟然一語成讖。⁹⁹

此外，他提到曾聽過在咖啡館中的兩位公子哥們的互相問候。其中第一名男子跟第二名男子傑克說道：「這段時間你死到哪裡去了？」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223-224. 舉例而言，在 1713 年當時安妮女王性命垂危，有關在法國的老僭王(Old Pretender, James Francis Edward Stuart, 1688-1766)將會渡海出兵英格蘭的傳言不斷，笛福便說有些咖啡館中的人「口中充滿這種叛國」謠言，Daniel Defoe, *Defoe's Review*, vol. 9, 294. 在 1683 年輝格派的泰特斯·奧茨(Titus Oates, 1649-1705)在一場激烈辯論中被對手用藤條打了幾下頭，在一時憤怒之下便將自己的熱咖啡潑到對方的眼睛。此外，笛福曾提到有一個律師在咖啡館內以「最下流的語言辱罵」一個陌生人，還要求對方拔劍出來與他一決生死，見 Defoe, *Review*, vol. 1, 588.

⁹⁸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1 (1724), in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1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166. 笛福在《英格蘭商人全書》裡頭也提到，商人的名聲很容易在咖啡屋中的流言蜚語中落得聲敗名裂，見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160.

⁹⁹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1725),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157-158.

而傑克的回答同樣不知所云。他們還以妓女的兒子、母狗的兒子來彼此稱呼。笛福感歎道，那些在咖啡天裡穿著得體的人的對話內容原來有些是滿口胡言，「不知所云，總之，讓自己看起來就像個傻瓜。」¹⁰⁰這樣子的談吐，不僅邪惡而且毫無意義，這些正是他認為會阻礙文雅發展的對話內容。¹⁰¹尤有甚者，他說在許多咖啡館中可以看到人性中最惡劣的一面，彷彿「看到許多人模人樣的魔鬼」。¹⁰²因此，雖然《觀察者》對於咖啡館文化不是毫無保留地讚美，但是笛福的觀點相比起來顯然要來得更具懷疑態度。

十八世紀初的英格蘭倡議文雅的文人們，他們所針對的讀者各不相同。第三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讀者多為貴族與鄉紳階層，阿迪生等人則是受伯爵影響，將他鄉紳色彩濃厚的哲學性思辨轉化為較為淺白清晰，廣受城市中間階層歡迎的文字。笛福的讀者則是在社會地位與財富上更次一等的中下階層。因此，笛福在寫作時會採取更簡明，更為貼近庶民的文風以及作法，將文雅文化簡化為適合如貿易商、小店主(*shopkeeper*)等人閱讀的作品。史蒂爾在作品中有針對如何糾正民眾咒罵惡習提出建議解方，而笛福對於史氏主張的評價，正好可以看出這兩位作家在設定目標讀者上的差異。史蒂爾在《閒談者》中曾描述應該如何改善一個人時常口出惡言的習慣。在故事中比克斯塔夫先生有一個喜好罵髒話的朋友，但是他往往在咒罵時渾然不知。於是，在朋友梳妝打扮同時操著一連串粗話時，比克斯塔夫便將朋友所說的粗話

¹⁰⁰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8, 294.

¹⁰¹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09.

¹⁰² Daniel Defoe,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 (1726), in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edited by John Mullan, vol. 6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268.

都記錄在紙上。而當他發洩完情緒之後，比克斯塔夫將剛剛所寫下的文字給這個朋友看。這個朋友看到之後，原先以為是一個極為低俗的人講的話，不過繼續往下讀下去才發現，原來這是自己無意識之間所說的話。這個作法點醒了他，因很有效地讓他洗心革面，「開始學習在說話當中不再咒罵。」¹⁰³

笛福對於這個主題甚感興趣，他在三個月後的《評論》中回應了史蒂爾上述這種改善言談之方式。笛福直言道，這些性喜說粗話的人往往連正常的語言交談都有困難，遑論要用紙筆將彼此的口語用文字記錄下來。儘管如此，笛福並非否定史蒂爾的這種做法，只不過他認為現實環境並不允許這種方法。以當時英格蘭的狀況而言，笛福推估五十個人當中，大概只有一個人有能力做到抄寫口語，這對於當前英格蘭社會道德低落的問題實在緩不濟急。¹⁰⁴此外，兩人的說法亦反映出史蒂爾並未預設那些不具備相當書寫能力的人會是他的讀者，而笛福則預期自己的讀者當中有一部分人的教育程度並不高。笛福認為要將文雅文化推廣到工商階層之中，就必須要對於現實狀況有清楚認識，而不是將適用於鄉紳階層的作法套用商人階層上頭。他認為這樣子相當突兀，就如同將鹿和獵狗、馬跟驢、獅子與熊硬湊在一塊生活。¹⁰⁵笛福指出，《閒談者》與《觀察者》是英格蘭在那個時代最受歡迎，而且是令人讀起來相當愉悅的著作，不過它們對於瀆神、低俗言論的批判過於溫文儒雅且無力。笛福認為旁觀者式的文雅過於溫柔和高雅，對於目前病入膏肓的社會無立竿見影之效，而且不容易實踐。笛福提出雙管齊下的實際可行作法：首先，應該要用質樸直接的話語來訓誡民眾，畢

¹⁰³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vol. 1, 115.

¹⁰⁴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8, 295.

¹⁰⁵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2, 125.

竟他們只會基本的英文讀寫，像史蒂爾所說的要寫下自己的言談，甚至將其翻譯為拉丁文並且覆誦數次，這種做法無異於緣木求魚。¹⁰⁶其次，應該採取的做法是要教會領袖、政府官員等人以身作則地注意自己的言行。¹⁰⁷若是英格蘭的統治階層自身謹言慎行，不再發表像是無神論之類的瀆神言論，並且不再因為酗酒而大出洋相，這些愚蠢可鄙的惡習，很快便會遭到眾人唾棄並且變得不受歡迎。¹⁰⁸相反地，一個自身成日醉醺醺的牧師或者是私生活敗壞的地方官員，勢必不可能成功地推動社會風俗的改良。¹⁰⁹

正如上文提到，史蒂爾認為紳士氣質不是靠家族出身繼承而來。笛福在提及英格蘭鄉紳時，也說在現在這個時代，許多歷史悠久的大家族都因為家道中落而消失，而維持這種氣質的方式，還是必須靠自己的「學習、旅行、談話」，才能培養出真正的文雅之士。¹¹⁰文雅之士在笛福的描述當中，交談是其中的一大重點，他跟《觀察者》中的理念相同，認為理想的交談既需實質性的內容，也應該讓參與者感到愉快。¹¹¹換句話說，善於與他人交談的人，在交談中不會鄙視學問，亦不會去吹噓自己的出身與財富，更不會去蔑視他人。¹¹²此外，笛福亦與沙夫茨伯里一

¹⁰⁶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8, 295.

¹⁰⁷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8, 294.

¹⁰⁸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114.

¹⁰⁹ Daniel Defoe, *The Six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s of a Parliament-Man* (1700 [for 1701]),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 A. Downie, vol. 2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37.

¹¹⁰ Daniel Defoe, *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 (1728-1729),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1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188.

¹¹¹ Daniel Defoe, *The Commentator*, 235.

¹¹² Daniel Defoe, *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 101.

樣，使用將石頭磨亮磨滑的譬喻，他認為人類的靈魂與能力似尚未磨光的鑽石一般，唯有在砥礪打磨之後，其光輝方能顯現。¹¹³笛福在反思不服從國教徒學院(Dissenting academies)的教育規劃時，也建議道應該要多增加對於口語的訓練，俾使學院的教育水準追趕上牛津與劍橋大學。他認為交談可以完善一位紳士的談吐水準，而且讓他的品味修養各方面一併提升。¹¹⁴笛福在另一份期刊《評論者》(*The Commentator*)中亦指出，人必須要經過長時間的積累，方能讓自己遠離無意義的空洞談話，也才能在與他人交談之時展現出智慧之光以及文雅。¹¹⁵從反面來看，那些耽於享樂而不努力自我提升的人，其談吐必然充滿暴戾之氣，是不易親近並且不適合成為談話對象的憤世嫉俗之人。¹¹⁶

由於這種對於交談對話價值的信服，笛福不認為在增進個人修養這方面而言，獨處會是最好的作法。他相信若一個人的心靈真正地成熟，那麼就算身處於喧囂的都市中也無礙於自我修煉，況且群居生活還能對其有所助益。¹¹⁷在笛福的人性觀中，人類天生因為原罪而帶有缺陷，而獨處生活或是如中古時代苦行僧將自己放逐於荒野之中，反而使自身缺陷更加放大而無助於改善。¹¹⁸相對地，人類在群居生活中，

¹¹³ Daniel Defoe, *An Essay upon Projects*, 126.

¹¹⁴ Daniel Defoe,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arties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J. Baker, 1712), 316-317.

¹¹⁵ Daniel Defoe, *The Commentator*, 236.

¹¹⁶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06.

¹¹⁷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66.

¹¹⁸ 對於笛福人性觀、原罪觀的簡短討論，見 G. A. Starr,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ity Not as Old as the Creation: The Last of Defoe's Performances*, edited by G. A. Starr, by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25-26.

因為時常與他人往來，反而可以學習他人之長處，而且在交談之中更加認識自己的長處與不足之處。¹¹⁹笛福也指出人們都應該朝著能夠在對話中能夠令他人愉快的人而努力，並且培養出以下這種文雅的表現：

臉上總是帶著笑容，他的靈魂因他的好脾氣而不斷地閃光；幽默和令人愉快的氣質永遠停留在他的眉宇間，他在任何場合都是如此，總是讓別人甚至是他自己都感到愉快。¹²⁰

在討論完笛福對於交談的理想，以及其如何幫助人們培養自身之文雅後，本文下個部分所要討論的是，商業隨著人們經常往來而勃興，而在笛福對於商業生活的分析與觀察中，商業對於文雅文化的助益與衝擊分別為何。

五、言語的交換與商品的交換：商業與文雅文化

在一個人們頻繁進行交談、社交活動的社會並不一定必然有著蓬勃的商業發展，但是從另一個方向來看，在興盛的商業社會中，其中的人們為了交易買賣，勢必要與陌生人頻繁地接觸與談話。在這樣的社會中思想家會開始思考：商業發展對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究竟會帶來正面或是負面的影響，以及人與人之間是否會因為這樣子的頻繁互動(如對話)而更具文雅。在笛福的時代，英格蘭正處於商業快速發展，海外殖民擴張之際，而德性、文雅與商業之間的關係是當時思想界強烈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其中一群文人(即波考克、伊斯萬·洪特[István

¹¹⁹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06-107.

¹²⁰ Daniel Defoe,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02.

Hont, 1947-2013]所稱的新哈林頓主義者，或公民人文主義者)主張這些新興財富有害於國民道德以及文雅的發展，而且會導致國家的武德敗落與軍力減弱。代表作者像是查理·達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安德魯·弗萊徹(Andrew Fletcher of Saltoun, 1655-1716)。¹²¹

另一派作家則是辯護商業具有正面價值。代表作家除了笛福以外，還有例如尼可拉斯·巴本(Nicholas Barbon, c. 1640-c. 1698)、曼德維爾與時代稍晚的休姆。¹²²他們認為商業發展對於國民的德性而言並非洪水猛獸，經濟資源上的富足方能使國家有能力添購最為先進的船艦武器，對於國防而言是助力而遠非阻礙。在個人德性方面，笛福等人認為商業促使許多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交易，而在此過程中人們會學著彼此尊重。店家與各種商人都必須彬彬有禮地對待顧客，才能夠將顧客留住，不然他們將不會再光顧。在交易時，文明的談吐對於從事交易的人而言是絕對必要的，因為這是對於一個人是否具備禮貌的檢驗。¹²³進一步而言，商人在尊重顧客的過程中，也將這種文明、禮貌的價值內化，變成是與所有人打交道時都應該具備的樣子。投入貿易以及商業會讓商業國家的公民重視某些德性的實踐，例如勤奮、節儉、守時、誠實和寬容。除了笛福之外，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與休姆等人的著作，針對這些德性和促進商業繁榮的社會道德表示贊揚，並且用此來解釋為什麼商業社會是文

¹²¹ 見註 14。

¹²² Laurence Dickey, "Power, Commerce and Natural Law in Daniel Defoe's Political Writings 1698-1707," in *A Union for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British Union of 1707*, edited by John Rober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96.

¹²³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2 (1727), 141.

明的，而過去的封建社會則非如此。¹²⁴因此商業、交談與文雅三者在商業社會中具備相輔相成的良性關係。

笛福以及其他擁護商業益處的思想家們(如阿迪生等輝格派成員)敏銳地洞察到商業社會帶來之新典範，他們為了要改善大多數民眾尚未對此轉變有清楚認知的狀況，便運用在咖啡館等公共場所流通的期刊，向人們傳布關於各種公共議題，以及哪些事情是對於公共利益有幫助的。¹²⁵笛福的《評論》從 1704 年連續出版到 1713 年，以每週二至三期的頻率出刊；阿迪生與史蒂爾的《觀察者》每份售價僅 1 便士，從 1711 年連載至 1714 年每天出版一共有 635 期。¹²⁶提供報紙雜誌是咖啡館的特色之一，也是它們受歡迎的主要原因之一，每一份刊物報紙都可以被閱讀和討論許多次。阿迪生自己估計每賣出一本《觀察者》，就有二十個讀者。大聲朗讀新聞也是常見的做法，這樣每個讀者都有幾個聽眾。¹²⁷笛福的《評論》每期約有五百份，按照阿迪生的說法讀

¹²⁴ Laurence Dickey, "Doux-Commerce and Humanitarian Values: Free Trade, Sociability and Universal Benevol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Thinking," *Grotiana* 22:1 (January 2001): 273-274.

¹²⁵ Nicholas T. Phillipson,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307. 根據研究英國男性識字率在 1500 年是一成，而到了 1714 年為百分之四十五，到了十八世紀中則為百分之六十。而女性在 1714 年為兩成五，到了 1750 年則為四成。而會到咖啡館的人絕大多數皆為中間階層以上的人群，甚至還有富商、鄉紳等等。這群人在十七世紀時幾乎全部都已經具備閱讀能力。而且倫敦地區居民識字的比率又更高，在復辟時代便有近八成以上的男性識字。見 John Brewer,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141; Valérie Capdeville, "Club Sociabi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ble' Practices," 50.

¹²⁶ Adam Fox, "Words, Words, Words: Education, Literacy and Print," in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500-1750*, edited by Keith Wright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6.

¹²⁷ Ian Atherton, "The Press and Popular Political Opinion," in *A Companion to*

者人數在一萬人左右。雖然這種推斷有些模糊，不過在 1700 年代，每一期的《評論》都會分送到英格蘭各地的書店及咖啡館，由笛福在當地的聯絡人負責分送。而當笛福在 1706-1707 年人在蘇格蘭的時候，甚至還同時發行愛丁堡版本以及倫敦版本的《評論》。此外，斯威夫特主筆的《檢驗者》(*The Examiner*)、查爾斯·雷斯利(Charles Leslie, 1650-1722)的《詳述雜誌》(*The Rehearsal*)還有一些小冊子，例如《論〈評論〉》(*Review Reviewed*)都曾經特別針對笛福在《評論》的意見加以駁斥。這些都是笛福刊物在各地流通以及發揮影響力的證明。¹²⁸

笛福、阿迪生等作家透過各種期刊雜誌向讀者傳達他們關於國家公共利益的觀點。舉例而言，高教會托瑞派(High Church Tories)的排外心態(例如對於威廉三世的批評以及歐洲移民的歧視)、對於不服從國教者的宗教不寬容以及對於商業貿易的批判，在笛福以及其他輝格作家的筆下，便是對於英格蘭國家利益之傷害。相反的，笛福主張要在政治上審慎，而在宗教上要堅持寬容，不應該因為清教徒在宗教儀式上的不服從而加以迫害；而且這群人正是英格蘭商人階層的重要組成分子，迫害他們反而會導致英格蘭的財富不斷流失。¹²⁹為了國家整體利益福祉著想，「不應該強迫弟兄們接受儀式與領聖餐的規範」，因為這樣只會讓「成千上萬的人遠離國教會。」¹³⁰又像是在對抗法國的時刻中，笛福也寫到：「為了公共利益、為了整個時代的福祉以及未來世代著想」，英國人應該堅持反對法國天主教勢力的入侵，堅守新教在英國的根

Stuart Britain, edited by Barry Coward (Oxford: Blackwell, 2003), 92.

¹²⁸ James Alan Downie, "Stating Facts Right about Defoe's *Review*," *Prose Studies* 16:1 (April 1993): 8-22.

¹²⁹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6, 538.

¹³⁰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2, 747.

基。¹³¹史蒂爾在《閒談者》第一百八十三期指出，對祖國的愛、對於公共福祉的愛，是一個有德性的人的首要以及最為基本的素質。他指出「現在我們的談話之中對於公共福祉的討論愈來愈少」，希望讀者可以反思諸己，去追求這種「光榮、偉大」的目標。¹³²

菲利浦森曾指出，英格蘭在光榮革命後因為在歐陸進行新型態的戰爭，¹³³以及商業擴張而發生巨變，英格蘭思想家判斷公共利益的標準，自然也與過去截然不同。他同時指出休姆觀察商業往往會帶來文明化的效果，最先進的地區往往也是商業最為繁榮之處。菲氏繼

¹³¹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8, 686.

¹³²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vol. 2, 492.

¹³³ 首先是 1688 至 1697 年的九年戰爭，接著是 1701 年至 1714 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由於這兩場戰爭的規模遠大於前一世紀的戰爭，英格蘭政府必須要仰賴在所謂「財政革命」後出現的英格蘭銀行戰爭融資和國債等方式方有能力負擔軍費。就規模擴大舉例而言，皇家造船廠的雇員人數在 1689 年初的 1,800 人而在 1697 年增加至 4,200 人，到了 1712 年更達到 5,800 人。這種新型態的大規模戰爭，極為考驗國家的財政能力。見 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129. 正如洪特所指出的，現代戰爭的需求導致了對財政不斷增長的要求，這種程度的負擔在規模上是過去的知識完全無法滿足的。現在就連是像傳統上不喜貿易的法國也要開始留心，既將其視為收入來源，又將其作為提高軍事效能之資源。洪特以政治經濟思想家達文南特為例說明此點。達文南特活躍時間早於笛福一個世代，他指出現代戰爭給每個國家肩上施加上極為無情財政重擔。他認為現在富國固然還是有陷入享受華奢墮入羸弱的危險，但是沒能贏得充足財富的窮國，即便再怎麼驍勇善戰，極為可能會遭受外國奴役。達文南特基於對商業重要性的這種體悟，他主張現在貿易必須被視為一件國家大事，對於政治家以及官員的教育當中，都應該要去認識貿易的重要性，因為這在現代已成為攸關國家存亡之大事。見 Istvan Hont, "Fre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Limits to National Politics," in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7, 212-213.

續指出，這種將商業以及其文明教化力量連結起來的觀點，可以繼續上溯到笛福的著作當中。他在笛福身上注意到將商業與文雅聯合在一塊的想法，亦即商業具有深化人的文雅傾向(也就是休姆所謂的文明化的)的力量。¹³⁴菲氏與克萊因都認為，商業與文明化之間的聯繫是到蘇格蘭啟蒙的時候，特別是從休姆之後才獲得充分的闡述。

筆者在本節以下部分將指出，笛福在其寫作生涯從早期至晚期始，終強調商業與文雅之間的正面關係，並且指出商業與文明與教化力量之間的聯繫。無論是在 1710 年代的《貿易通史》(*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或是 1720 年代的《英格蘭商業計畫》(*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英格蘭商人全書》或是《大不列顛全島遊記》都對這兩點有相關闡述。

笛福認為商業與對話之間關係密切，他並且引用在兩千多年前的腓尼基人那個時代便已存在來強調這點。將商業與腓尼基人連結在一起的說法，也被記載於《聖經》當中(《歷代志》上 14 章、《以賽亞書》23 章)。根據克里斯多佛·布洛克(Christopher Brooke)的研究，從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哈林頓以降，像是巴本、孟德斯鳩等人都曾提及迦太基人(與腓尼基人)與商業之間的聯繫，¹³⁵不過對其有特別長篇幅著墨的，則是法國作家皮耶·丹尼爾·輝特(Pierre Daniel Huet, 1630-1721)。輝特強調腓尼基人(及其移居、殖民北非的後裔迦太基人)是人類歷史上首先將商業發揚光大的民族。¹³⁶笛福的說法在這方面與輝特相似，並

¹³⁴ Nicholas T. Phillipson,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317.

¹³⁵ Christopher Brooke, "Eighteenth-Century Carthage," in *Commerce and Peace in the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Béla Kapossy, Isaac Nakhimovsky, and Richard Whatmo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11-112.

¹³⁶ 例如 Pierre-Daniel Huet,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London: B. Lintot, 1717), 16-17. 笛福對於輝特的引用，見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1726), in

且在著作中引用輝特之著作。¹³⁷

然而，笛福的獨特之處在於將商業與文明教化連結在一起，因此他也強調腓尼基人在從事商業貿易以前乃是野蠻無文明的。¹³⁸而唯有當他們開始與其他國家進行商業往來以後，方才開始學習如何與人和平地交談，也才能夠開始學習文雅以及禮儀。笛福之所以提及腓尼基人，是因為他對於英格蘭商業興起的關注。腓尼基人在笛福筆下，是勤奮、理性和實用態度的代言人，他們也因此能夠妥善地運用上帝提供給人類的資源。腓尼基人的提爾城(Tyre)被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 c. 634 BC-c. 562 BC)毀滅固然是場悲劇，但是這也帶來了非預期的正面影響，那便是「一個勤勞而有用的民族因此分散到世界各地」，讓貿易商業的技能流傳到全世界。¹³⁹在這種解釋之下，英格蘭的航海技術與貿易知識也是間接承繼自腓尼基人。雖然笛福並未提及腓尼基人在滅亡後流轉到英格蘭居住，但是當強盛的提爾城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時，亦曾為了取得不列顛的錫、鉛、煤，而在這裡建立過殖民地；笛福便透過這樣的間接關係，建立起英格蘭與上古商業民族腓尼基人的歷史傳承。¹⁴⁰此外，他強調「腓尼基人似乎就是那個時代的英格蘭人。」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4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142.

¹³⁷ 航海船隻為貿易的必備工具，笛福相信船隻首次出現的兩千年之間，船隻的進行都是直接採取手滑的方式。而腓尼基是首先發展出船槳的人群，也因此讓他們的船隻更易操作，而且速度更快。Daniel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68-69.

¹³⁸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 for the month of July* (London: J. Baker, 1713), 7.

¹³⁹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72.

¹⁴⁰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00.

兩個民族雖然都不善於發明，但咸擅長於改良其他民族的發明物。¹⁴¹笛福認為英格蘭應該將目標設定為：恢復古代迦太基人碩果累累的商業成就，以及他們在當時達到的強盛境況；而笛福認為對於當時的英格蘭而言，要完成上述目標的具體行動便是加速對非洲的探險與貿易。¹⁴²笛福還相信迦太基人(迦太基最初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笛福在其作品中視其為廣義上的腓尼基人)是最初發現美洲，並且在那裡建立殖民地的民族，只不過關於此後的一切記憶都隨著羅馬人的征服以及他們對於商業的忽視而隨之消逝。而英格蘭對於美洲的殖民便是對此光榮歷史的復興，也因此笛福稱呼漢尼拔(Hannibal, 247 BC-c. 183 BC)為迦太基的沃爾特·羅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52-1618)，也說羅利是英格蘭的漢尼拔。¹⁴³

當迦太基滅亡後，笛福相信有一部分的迦太基人逃難到法蘭德斯地區，同時也將製造亞麻與羊毛的技術引入西北歐。接著，由於法蘭德斯地區本身缺乏羊毛，他們因此不得不從英格蘭採購羊毛。笛福藉此將廣義上的腓尼基人，視為英格蘭最光榮產業(羊毛貿易)的開創者之一。¹⁴⁴英格蘭的文明水準在羊毛貿易成長的鼓勵下因而提升，並且開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交流。正如笛福對於貿易起源之論說一樣，他指出上帝是因為要鼓勵各地人群之間相互交通理解，所以才讓各個地區的資源、氣候不同。上帝：

為了商業在世界上運行，祂替我們作好了預備，當我們努力在追求亟需的改善時給予協助，並且要求貿易成果要以最為正直與謹慎的方式被保存、鼓勵並且延伸……這些成果要用來支

¹⁴¹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76.

¹⁴²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14.

¹⁴³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93-94.

¹⁴⁴ Daniel Defoe,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84;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77.

持、維護、雇用、改善上帝之造物(即人類)，特別是為了世界各國以及各個家庭之間的互相協助、福祉與支持。¹⁴⁵

國與國之間關係也因為彼此頻繁交易而變得更為文明，國家之間減少兵戎相見的頻率，而是改由在商業世界中和平地互助與競爭。他在另一期的《評論》指出：

請允許我冒昧地告訴你們，通過貿易可以增加以及改進什麼……假設你們將達成一致意見與協議的情況，那麼仇恨便會消除而且一切矛盾的性情都會被糾正必且被減弱；兩國就這麼可以被放入同一個紐帶之中，並且將貿易這個偉大事業向前推進。如果你做不到上述所說，那麼我們就不用再討論貿易與合作了；如果你們沒有和平，你們只能有微不足道的貿易量，因為兩個互相齟齬的夥伴國該如何合作呢？成功的貿易始終來自於彼此和氣地(pleasantly)交易，彼此協助與相互信任。¹⁴⁶

笛福也留意到，因為商業發展而出現的大量且持續發展的交流互動，並且指出進行文明溝通所必需具備的知識、學問，都因為貿易擴張的緣故而不斷精進。他寫道：

人類的這種交通往來不僅有助於把腓尼基居民傳播到世界的偏遠地區，而且也有助於他們遵行造物主最初給他們的指示，即遍滿地面(replenish the Earth)；但是這種交通往來必然會帶來貿易，貿易接著會帶來航行，航行途中的種種發現則讓殖民地(plantations)建立

¹⁴⁵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9, 213. 在 1706 年的《評論》中，笛福有著相同的說法，他認為上帝預先安排了地球上各地相異的自然環境：「上帝根據自然規律，以祂無限的智慧造就了各種不同的後果，也因為如此，世界上世世代代的人們若不幫助以及協力(Concurrence)彼此，人類是不可能一直存續下去的。」見 Defoe, *Review*, vol. 3, 13.

¹⁴⁶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9, 197.

起來，而這些偏遠的殖民地再次增加了交通往來的密度：因此，每一種讓人類進步的才能都在世界上流傳開來，全世界的人彷彿現在都對世界上其他人有了往來，遠隔重洋的民族們相互交談，不同人群彼此理解；不，我應該這麼說：人們通過書信、信使和各種交通往來不斷地交談。¹⁴⁷

說得誇張一些，貿易在笛福的論述中，成為了推動「世界上藝術、科學以及人類智慧成就的重要推手。」¹⁴⁸英格蘭人便是在跟隨腓尼基人榜樣的過程中，在試圖復興他們在古代於商業貿易上的成就的過程中，脫離野蠻狀態，開始有進行文雅、不具暴戾之氣的交談的可能性。¹⁴⁹

除了國家之間會因為貿易交換貨物而使得關係變得緊密，進而得以和平相處；在個人層面上，笛福亦指出人在商業社會中為了要讓交易順利進行，勢必會隱藏自己的真正想法；人與人之間會避免彼此衝突，社會的暴戾之氣因此消弭。他不認為這種作法是虛偽的表現，而是認為這是社會之所以能夠讓一群人生活於其中，仍然可以順利運作的必要性與關鍵。像是笛福的《英格蘭商人全書》的核心主張之一便是：在商業社會當中，商人在面對顧客時絕對不能表露出自我情緒，言行舉止時刻都需要維持「禮儀、禮貌以及禮節」。¹⁵⁰笛福認為生意人必須要彬彬有禮地對待客人，這樣方有可能留下他們。做生意之人必需要去討好自己的衣食父母(顧客)，而笛福認為最佳的討好方式便是要在言行都恪遵文明，而且在商業交易以及談話之中都要有禮貌，他寫道：

¹⁴⁷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77.

¹⁴⁸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for the Month of June* (London: J. Baker, 1713), 24.

¹⁴⁹ Daniel Defoe,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for the Month of August* (London: J. Baker, 1713), 17.

¹⁵⁰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91.

商人必須在與所有人交通往來之時都秉持公正，所以他同時也會是文明的；在交易與交談時要具備禮貌，這是我們與所有人打交道時都應該秉持的；雖然在兩種場合下都應這麼做，在前者中應該要特別有禮：對話中的文明態度對我們而言是必要之事，因為這是對自身是否具備良好禮貌的檢驗，而且能讓自身行為更具榮耀。¹⁵¹

同樣是在《英格蘭商人全書》中，笛福寫道：當一個店主面對惡質顧客挑釁的時候，正面發生衝突是絕對不被允許的。笛福用誇飾的筆法寫道，店主可以暫時退到樓上閣樓毆打妻兒洩憤，然後重新整理出一臉笑容下來面對顧客，讓自己表現得宛如羔羊般溫順有禮。¹⁵²不過，笛福在其他著作中指出，男主人在家庭是不被允許毆打妻兒的，反而應該深愛著自己的家人。¹⁵³由此推斷，上述的故事純粹是用來強化論點的戲劇性筆法，不過從中也可以洞察出到笛福對於人與人之間在商業世界中應如何互動的看法，以及商業對於人與人之間互動變得更加文明的例證。亦即，人們在商業世界中必須互相尊重，尤其是店主在面對刻意刁難的客人應該要控制住自己的衝動，「作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商人，他「必須對自己無情，不能有衝動亦不能有怨恨；他絕不能生氣，至少表面上要如此。」¹⁵⁴

雖然在故事中的女客人「對待店主的方式是一種刻意的粗魯，並且盡其所能地給他添麻煩，如上所述：她假裝不喜歡店主給他看的商

¹⁵¹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2, 141.

¹⁵²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96-97.

¹⁵³ 例如 Daniel Defoe, *The Family Instructor*, vol. 2 (1718),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2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38, 137.

¹⁵⁴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97, 90.

品，用一種輕蔑的神氣態度轉過身去，有意無意地指出他的店鋪裝潢差勁，而且說在別的店必定很容易找到她心儀的商品。而這位布商出乎這位客人的意料，以極佳的禮節與禮貌來回應她。」最終店主的耐心與堅持獲得了勝利，這位女顧客低聲向同行友人稱讚道店主是她「一生中所遇到的最有禮貌、最具紳士風度的商人」；而且重複了店主的「謙遜與禮貌」，最後買了價格約 70 磅的布料，而且成為長年主顧。¹⁵⁵

笛福指出這種自我情緒之偽裝以及假裝具備某些人為德性(*artificial virtues*)的假扮，雖然不符合公民人文主義的理想(亦即人的善言善行應當是發自內心之真誠德性)，但是他認為問題主要不是因為商業社會之出現。因為就算是在前商業化時代的英格蘭道德水準也並未比現代要高。相對的，古代的人們同樣將自身利益視為最高指導原則，虛偽偽善的事情一樣層出不窮。既然過去與現代上都不存在著人們為他人無私付出的狀況，已經進入商業時代的英格蘭沒有理由要逆轉時針，去追求古人的生活方式。相反的，十八世紀上半葉的英格蘭因為商業擴張而變得更加富裕舒適，各式各樣的文雅活動較之十八世紀以前的任何時代都要更加蓬勃興盛，像是在文學、藝術表演都出現長足進展，這與古代的狀況相比無疑更為理想。¹⁵⁶

¹⁵⁵ Daniel Defoe,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94-96.

¹⁵⁶ 文學方面，由於識字率以及國民收入的增加，從十八世紀開始出現職業文人，也就是不需要仰賴於貴族的支持，可以用版稅、稿費來支撐自己生計的文人(笛福的長篇、短篇作品保守估計至少有三百部)，在聖保羅大教堂周邊擠滿了為數眾多的書商以及印刷商。《觀察者》、《魯賓遜漂流記》或《格列佛遊記》等作品暢銷的數量，都是上個世紀的人所無法想像的。這種發展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出版許可法》於 1695 年過期終止，所以出版品不再需要被政府審核便可直接發行，再加上當時黨派之間的辯論熾熱，也加上廣大群眾對於文學的渴望，再加上眾人可支配收入以及閒暇時間的增加，都是文雅文化茁壯過程中的例證。此外，例如從 1690 年代開

商業(commerce)在十八世紀初包含了商品的交換與語言的交換(在這個意義上, commerce 可譯為往來、社交), 而人際之間的此種往來, 在文雅文化中的一種重要表現, 便是男女之間在社交場合上的互動。這種兩性之間在社交活動中的正面及健康的互動, 在當時的文雅文化當中是重要的一個部分, 《觀察者》的作家們認為在女性參與社交活動這行為本身, 無論對於其中的男性或是女性之文明修養皆能有所提升。例如, 阿迪生在《觀察者》中鼓勵男性與那些可敬的女性進行接觸, 而且他說這樣子的互動有助於男性具備「溫柔且富有同理心」(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¹⁵⁷的氣質, 而且在這麼做的同時, 「完善與淬煉」自己的性情, 讓文雅成為舉止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¹⁵⁸就女性而言, 阿迪生也指出她們在對話中應該要注意的部分, 例如他呼籲女士們在公開場合應該要避免大聲談論私事; 另外當對話突然停頓時, 沈默會比胡說八道來得更為理想等等。¹⁵⁹

笛福的 3 卷《大不列顛全島遊記》(*A tour thro'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於 1724-1727 年出版, 本書以書信的形式, 記錄下了英格蘭、蘇格

始出現大量週刊、報紙。像是在 1691 年到 1697 年便有 74 種期刊出版。當時人們便在俱樂部、咖啡廳、客廳中閱讀這些刊物。在《觀察者》最受歡迎的時刻, 一期可以賣出三千冊。表演方面例如皇家音樂學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於倫敦成立, 目的是要在倫敦創作、演出歌劇。見 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434-456.

¹⁵⁷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242.

¹⁵⁸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4, 21.

¹⁵⁹ Joseph Addison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vol. 1, 94. 在笛福與阿迪生作品問世二十年後, 休姆討論文雅時也提到, 一些蠻荒之地的人民在脫離蠻荒狀態後會變得更具文雅氣質, 在這樣的地方「男女會以一種輕鬆而友好的方式在一塊聚會」, 而這種聚會反過來又能夠幫助男女性雙方的舉止的改善與提升。David Hume, "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7), 271.

蘭、威爾斯各地的人文風土，其中對各地區的關注以當地的商業與文雅發展為重心，而上述《觀察者》對女性在文雅文化中關心，也出現在本書之中。舉例而言，這種將商業、對話與文雅連結在一起的論述方式呈現在笛福對於威爾斯的卡馬森(Carmarthen)的描述上。笛福注意到卡馬森這個歷史悠久的威爾斯城鎮，該地居民比起居住於山區的居民更加文明以及有禮。他認為這是因為他們在從事商業活動時，必須與世界各地的人們交談，他們也因此培養出這樣的和藹態度以及親社會性。¹⁶⁰

再舉一例，笛福在紀錄西多塞特(West Dorset)的萊姆(Lyme, 其現代名稱為萊姆里傑斯[Lyme Regis])時，提及這裡是英格蘭於十七世紀一直到十八世紀初的造船業重鎮，同時是興盛的貿易港口，與法國、西班牙、紐芬蘭頻繁地進行貿易。由於這種與外地人頻繁的交流，這裡的人具備著「令人愉快的談話方式」，甚至可以說這裡的百姓是不列顛島上最有禮貌和最有教養的一群人。¹⁶¹受到這種風氣薰陶，萊姆的女性也會參與社交生活，男性、女性在此地的公共聚會中可以自由來往，雙方之間擁有對話的自由，無論男女在對話中以及相處之間都和藹可親而且彬彬有禮。¹⁶²此外，在倫敦東南方肯特郡的梅德斯通(Maidstone)因為供給倫敦大量水果(特別是櫻桃)、啤酒花、木材、鋪路石、玻璃器皿等等，人口眾多且普遍富裕。在這裡鄉紳們以及中上階層男女之間會互

¹⁶⁰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2 (1725),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2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174-176.

¹⁶¹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1, 247. 另見頁 176。當作者抵達威爾斯的港口鎮尼思(Neath)時，他認為這裡的人較擅於交談，這是因為這裡有商業活動的進行。「他們似乎通過做生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交談，因此他們比他們的鄰居更樂意與人交談。」

¹⁶²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1, 248.

相交談。笛福說「有修養、學問的人在這裡總是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享樂，同時又可以提高自己的修養。」¹⁶³另外笛福在造訪埃塞克斯的斯特拉特福德(Stratford)時，指出這裡是從離開工作崗位的退休人士之居住勝地，不過這裡之所以受歡迎不僅是可以「隱居鄉間，更重要的是能夠結識好友。」在這裡的聚會談話中，總是有女性成員，其中的對話水準都「極為理想」，而且這個地方沒有人聚集賭博亦無妓院等傷風敗俗場所的存在。¹⁶⁴

本節關注商業與文雅文化之關係，討論笛福對於古代民族腓尼基人在商業成就的讚揚，而這樣子的商業成就促進世界各地人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而非其他古代民族歷史中常見的征戰不休，此外這樣的商業成就也帶來文明溝通，還有其背後所需要的學識修養。除了國家層面之外，在個人修養上，無論是笛福對於商人之間的建議，或者是對於在英格蘭各地文雅活動中男女彼此和諧有水準的互動，笛福的著作中皆顯示出商業對於文雅文化之正面影響。

六、結語

文雅文化在近二十年來是十七世紀末和十八世紀英格蘭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研究成果指出，文雅深刻影響十八世紀人對於藝術與品味的概念，同時也影響時人的公民意識、經濟和政治等等。儘管文

¹⁶³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1, 153-154.

¹⁶⁴ Daniel Defoe,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1, 52. 關於晚近針對女性與文雅文化之專門研究，請見 Alison E. Hurley, "A Conversation of Their Own: Watering-Place Correspondence among the Bluestocking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0:1 (Fall 2006): 1-21; Soile Ylivuori, *Women and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odies, Identities,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雅文化所追求的理想作為有部分在十七世紀宮廷作家的禮儀書籍中便已出現，不過文雅的理論和詳細規範，以及對於社會之影響，則要到十八世紀之後方。這原是貴族建立自我認同以及辨識所屬成員，而制訂的一套行為準則，不過當中間階層逐漸累積起財富後，他們亦開始學習這類品味以及模仿上流人士的行為，試圖被認同為文雅之士的一分子，以進入社會菁英階層。從這樣的背景觀察，沙夫茨伯里的作品可被大致歸類至前者，而阿迪生的《觀察者》則屬於後者。他們皆傳達了一些在對話以及生活中的精確文雅規則，例如情感應該在何時表露以及該在何時隱藏，還有在談話中如何讓對方感到愉快，並且言之有物的藝術。

目前學界關於文雅論述的重要性，以及其對於十八世紀文化影響的討論，依然是以上述的沙夫茨伯里與阿迪生為最主要的對象，不過在十八世紀其實還存在著其他各種對於文雅文化的詮釋，本文所討論的笛福便是一個顯例。本文當中指出笛福對於《閒談者》與《觀察者》的稱讚以及批評，來說明他對於阿迪生式文雅的清純認識；而且從他時常用文雅、禮貌、禮儀等作為提高自身刊物可信度的說詞，也可以看出其對此文化的掌握。本文指出，笛福基於自己的出身以及目標讀者種種因素之考量，他所訴求的讀者是比起《觀察者》讀者的鄉紳階層較下一層的商人階層。通過這種普及手法，笛福讓英國的商人階層也可以獲得文雅，從而在社會上證明他們在經濟上已經取得的成就。他希望用更為容易達成，以及更為淺白的語言來普及阿迪生式文雅。他曾說自己的學問最適合傳達給那些「地位比我低或是與我平起平坐的人們。」¹⁶⁵這種樸素風格也是十八世紀文雅文化日益彰顯的特徵。

交談在阿迪生與沙夫茨伯里的作品中，除了是令人愉快的消遣、得體的舉止之外，同時是種文明的媒介。這同樣表現在笛福的論著中。

¹⁶⁵ Daniel Defoe, *Review*, vol. 2, 205.

笛福指出交談是一種在語言上的技巧，若要改變公民的素質，就必須讓他們具備妥善交談的這種技能。他相信語言具備改變人類行為的力量。菲利浦森的開創性研究指出，笛福對語言之重視以及暗示笛福對阿迪生式文雅發揮了影響之可能性。本文使用大量笛福之著作刻劃出他與阿迪生式文雅的連繫，更進一步指出笛福本身對於交談本身的說法便有其可觀之處。笛福歌頌友好的對話，鼓勵人們應該正向積極地互動。他在《評論》以及其他小冊子中不斷地鼓吹理智與務實，並且訴求符合情理。言語文雅之重點，對他而言，不在於精心培養的良好品味，而是在對話中展現出節制以及豐厚學養。

笛福與文雅文化密切相關的第二點是對商業社會的歡迎。笛福強調商業所帶來的非物質性影響力，亦即在與陌生人接觸的過程中，人們會學著彼此尊重，將同時會推進自身所具備的文雅。笛福正視在英國國內政治發展中商業發揮的影響力，並且歌頌帶其所帶來的文明化力量。並且強調商業在增加人在社會中的交往以及培養德性的對話所發揮的重要性。人們生活在因為商業而茁壯的城鎮中，他們喜好彼此交流新知，並且在其中展現出自己的智慧以及教養，而且對於談話、生活都具有品味。人與人之間都以友好的態度往來，人的修養與行為會因為這些由商業催生的城鎮生活不斷改進。

最後，透過理解笛福對於商業發展對於文雅之正面幫助後，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檢驗波考克對於笛福的評斷。波氏在討論笛福與弗萊徹在常備軍辯論中的異同說法時，指出兩人的價值觀便是「市民德性與商業之間的對立」；對於笛福而言，「真正的自由是現代的產物，而且只有在商業社會中才能追求得到。」¹⁶⁶波考克接著暗示笛福的觀點為「文雅輝格主義」(polite Whiggism)或所謂阿迪生式文雅之先驅。本文

¹⁶⁶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231.

則是將波氏的暗示說法強化為堅實之論證，筆者指出從笛福的各類作品中，可以看到笛福對於交談與文雅之關注與鼓勵，這與波氏關於阿迪生文雅之觀察若合符節。¹⁶⁷除了強化波氏的說法外，本文也指出在笛福的思想中德性與商業並不必須是對立的。笛福論證牽涉生產與流通的商業與文雅文化相得益彰，並且指出這與市民人文主義者最關注的公共利益緊密交織在一塊。在笛福的思想中，德性與商業之間並不必然是對立的，他所反對的是弗萊徹那種新哈林頓主義式的德性，也就是說對於德性的追求，已不再需要像弗萊徹所認為的要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型態中實現。相反的，笛福的主張與稍晚的阿迪生以及一個世代後的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鼓吹的相類。¹⁶⁸他主張德性可以在社交、文化、商業中產生，在其鼓吹的文雅文化中德性不僅不會被商業所腐化而是彼此相生相息，在這個意義上，笛福是阿迪生與蘇格蘭啟蒙的先行者與源頭之一。

(本文於 2019 年 6 月 30 日收稿；2020 年 5 月 23 日通過刊登)

*本文承蒙《新史學》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特申謝忱。

¹⁶⁷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236.

¹⁶⁸ Nicholas T. Phillipson,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City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Paul Fritz and David Williams (Toronto: Hakkert, 1973), 125-147; Nicholas T. Phillips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edited by Roy Porter and Mikuláš T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40.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笛福(Daniel Defoe)著，徐式谷譯，《笛福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Addison, Joseph and Richard Steele. *The Tatler*. Edited by Donald F. Bond.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Addison, Joseph and Richard Steele. *The Spectator*. Edited by Donald F. Bond. 5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Discoveries and Improvements (1725-1726)*. In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4.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for the Month of August*. London: J. Baker, 1713.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for the Month of July*. London: J. Baker, 1713.

Defoe, Daniel. *A General History of Trade.....for the Month of August*. London: J. Baker, 1713.

Defoe, Daniel. *A Plan of the English Commerce (1728)*.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Defoe, Daniel. *A System of Magick (1727)*. In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Edited by Peter Elmer. Vol. 7.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1 (1724). In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1.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Defoe, Daniel. *A Tour through the Whol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vol. 2 (1725). In *Writings on Travel, Discovery and History by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2.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1.

Defoe, Daniel. *An Essay upon Projects (1687)*.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8.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Defoe, Daniel. *Defoe's Review*. Edited by John McVeagh. 9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1720). In *The Novel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G. A. Starr. Vol. 3.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8.
- Defoe, Daniel. *The Commentator* (1720). In *The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9. 10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Compleat English Gentleman* (1728-1729).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10. 10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 Defoe, Daniel.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 (1725).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7. 10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2 (1727).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ohn McVeagh. Vol. 8. 10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Dyet of Poland, a Satyr* (1705). In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1.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The Family Instructor*, vol. 2 (1718). In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P. N. Furbank. Vol. 2. 10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 Defoe, Daniel.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Devil* (1726). In *Satire, Fantasy and Writings on the Supernatural*. Edited by John Mullan. Vol. 6.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3.
- Defoe, Daniel. *The Poor Man's Plea* (1698). Edited by J. A. Downie. Vol. 6. 8 Vols.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 Defoe, Daniel.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arties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J. Baker in Pater-Noster-Row, 1712.
- Defoe, Daniel. *The Protestant Monastery* (1727).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W. R. Owens. Vol. 8.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Defoe, Daniel. *The Six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s of a Parliament-Man* (1700 [for 1701]).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Edited by J. A. Downie. Vol. 2. 8 Vol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0.
- Huet, Pierre-Daniel. *The History of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ncients*. London: B. Lintot, 1717.

Hume, David. "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 In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Edited by Eugene F. Miller, 268-280.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1987.

二、近人論著

- 李猛，〈魯賓遜的世界〉，收入李猛，〈自然社會——自然法與現代道德世界的形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頁 1-40。
- 許奕辰，〈近代早期英格蘭咖啡館的禮儀文化(1659-171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陳正國，〈陌生人的歷史意義——亞當史密斯論商業社會的倫理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3：4(臺北，2012.12)，頁 779-835。
- 陳正國，〈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臺大文史哲學報》，76(臺北，2012.5)，頁 267-316。
- 劉禾著，叢郁譯，〈燃燒鏡底下的真實——笛福、「真瓷」與 18 世紀以來的跨文化書寫〉，收入李陀、陳燕谷主編，〈視界——第十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 70-97。
- 楊璐，〈傳統的變革與個體的重構——魯濱遜的出走、改造與重返〉，《社會》，37：1(上海，2017.1)，頁 61-93。
- Atherton, Ian. "The Press and Popular Political Opinion." In *A Companion to Stuart Britain*. Edited by Barry Coward, 88-110. Oxford: Blackwell, 2003.
- Bahlman, Dudley W. R. *The Moral Revolution of 168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Berry, Helen. *Gender, Society and Print Culture in Late-Stuart England: The Cultural World of the Athenian Mercury*. Aldershot: Ashgate, 2003.
- Berry, Helen. "Rethinking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Moll King's Coffee Hous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Flash Talk': The Alexander Prize Lectur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1 (2001): 65-81.
- Braddick, Michael J. 'Civility and Authority'.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1500-1800*. Edited by David Armitage and Michael J. Braddick, 93-112.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Brewer, John.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7.

- Brewer, John.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9.
- Brooke, Christopher. "Eighteenth-Century Carthage." In *Commerce and Peace in the Enlightenment*. Edited by Béla Kapossy, Isaac Nakhimovsky, and Richard Whatmore, 110-1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Burch, Charles Eaton. "Defoe and the Edinburgh 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16:63 (July 1940): 306-312.
- Burt, Shelley.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Between John Locke and the Devil in Augustan England." In *The Margins of Orthodoxy: Heterodox Writing and Cultural Response, 1660-1750*. Edited by Roger D. Lund, 149-6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apdeville, Valérie. "Club Sociabil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Sociable' Practices." In *British Sociabili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hallenging the Anglo-French Connection*. Edited by Valérie Capdeville and Alain Kerhervé, 45-68.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9.
- Carter, Philip. *Men and the Emergence of Polite Society, Britain 1660-18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Clark, Katherine. *Daniel Defoe: The Whole Frame of Nature, Time, and Providen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7.
- Clark, Peter. *British Clubs and Societies, 1580-1800: The Origins of an Associational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 Claydon, Tony. *William III and the Godly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ohen, Michèle. *Fashioning Masculin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Langua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Cowan, Brian. "Daniel Defoe's *Review*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English Periodical."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7:1 (Spring 2014): 79-110.
- Cowan, Brian. "Mr. Spectator and the Coffeehouse Public Sphere."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7:3 (Spring 2004): 345-366.
- Cowan, Brian. *The Social Life of Coffee: The Emergence of the British Coffeehous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raig, Andrew G. "The Movement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1688-1715."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980.
- Curtis, Tony C., and William A. Speck. "The 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Case Study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ral Reform." *Literature and History* 3 (March 1976): 45-64.
- Damrosch, Leopold. *God's Plot & Man's Stories: Studies in the Fictional Imagination from Milton to Field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 Furbank, P. N. and W. R. Owens. *A Critical Bibliography of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1998.
- Hartley, James E. "The Chameleon Daniel Defoe: Public Writing in the Age before Economic Theory." In *Money, Power, and Pri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the British Isles*. Edited by Charles Ivar McGrath and Christopher J. Fauske, 26-50.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 Dickey, Laurence. "Doux-Commerce and Humanitarian Values: Free Trade, Sociability and Universal Benevol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Thinking." *Grotiana* 22:1 (January 2001): 271-317.
- Dickey, Laurence. "Power, Commerce and Natural Law in Daniel Defoe's Political Writings 1698-1707." In *A Union for Empir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British Union of 1707*. Edited by John Robertson, 63-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Dickson, G. 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Macmillan, 1967.
- Downie, J. A. *Robert Harley and the Press: Propaganda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Age of Swift and Def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Downie, J. A. "Stating Facts Right about Defoe's Review." *Prose Studies* 16:1 (April 1993): 8-22.
- Earle, Peter. "The Middling Sort in London." In *The Middling Sort of People: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1550-1800*. Edited by Jonathan Barry and Christopher Brooks, 141-158.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UK, 1994.
- Ellis, Markman. "The Tea-Table, Women and Gossip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British Sociability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Challenging the Anglo-French Connection*. Edited by Valérie Capdeville and Alain Kerhervé, 69-88.

-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9.
- Fox, Adam.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
- Fox, Adam. "Words, Words, Words: Education, Literacy and Print." In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500-1750*. Edited by Keith Wrightson, 129-15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Goldsmith, M. M. "Liberty, Virtue, and the Rule of Law, 1689-1770." In *Republicanism, Liberty, and Commercial Society, 1649-1776*. Edited by David Wootton, 197-23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Goldsmith, M. M.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 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abermas, Jürgen.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German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Hayton, David. "Moral Reform and Country Politics in the Late Seventeenth-Century House of Commons." *Past & Present* 128:1 (August 1990): 48-89.
- Hont, Istvan. "Fre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Limits to National Politics." In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85-266.
- Hoppit, Julian. *A Land of Liberty? : England, 1689-1727*.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 Humphreys, A. R. "Addison, Steele, and the Periodical Essay." In *A Liter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 The Restoration and Eighteenth Century (1660-1789). Edited by George Sherburn and Donald F. Bond, 870-882. Seco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7.
- Hunter, J. Paul. *The Reluctant Pilgrim: Defoe's Emblematic Method and Quest for Form in Robinson Cruso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 Hurley, Alison E. "A Conversation of Their Own: Watering-Place Correspondence among the Bluestocking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0:1 (Fall 2006): 1-21.
- Klein, Lawrence E. "Coffeehouse Civility, 1660-1714: An Aspect of Post-Courtly Culture in England."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59:1 (January 1997): 30-51.
- Klein, Lawrence E. "Joseph Addison's Whiggism." In *"Cultures of Whiggism": New Essays*

- o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Paddy Bullard et al., 108-126.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 Klein, Lawrence E. "Liberty, Manners, and Politenes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Historical Journal* 32:3 (September 1989): 583-605.
- Klein, Lawrence E. "Property and Politeness in the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Whig Moralists: The Case of *the Spectator*." In *Early Modern Conceptions of Property*. Edited by John Brewer and Susan Staves, 221-233. London: Routledge, 1995.
- Klein, Lawrence E. *Shaftesbury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Mor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Knights, Mark.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Defoe and Swift." *History Compass* 3:1 (January 2005): 1-20.
- Knights, Mark. *Represent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in Later Stuart Britain: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ramnick, Isaac.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eier, Thomas Keith. *Defoe and the Defense of Commerce*. Victoria, B.C.: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Dept. of English, University of Victoria, 1987.
- Merrett, Robert James. *Daniel Defoe: Contraria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3.
- Novak, Maximillian E. *Daniel Defoe: Master of Fictions: His Life and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eltonen, Markku. "Politeness and Whiggism, 1688-173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8:2 (June 2005): 391-414.
- Peltonen, Markku. *The Due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ivility, Politeness and Hono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hillipson, Nicholas T. *David Hume: The Philosopher as Historia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1.
- Phillipson, Nicholas T. "Politics and Politeness in the Reigns of Anne and the Early Hanoverians." In *The Varieties of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1500-1800*. Edited by J. G. A. Pocock et al., 211-2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hillipson, Nicholas T. "Politics, Politeness and the Anglicisation of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Scottish Culture." In *Scotland and England: 1286-1815*. Edited by Roger

- A. Mason, 226-246. Edinburgh: J. Donald, 1987.
- Phillipson, Nicholas T. "Propriety, Property and Prudence: David Hum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Nicholas T. Phillipson and Quentin Skinner, 302-3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hillipson, Nicholas T.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Edited by Roy Porter and Mikulas Teich, 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Phillipson, Nicholas T.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In *City an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Paul Fritz and David Williams, 125-147. Toronto: Hakkert, 1973.
- Pincus, Steve. "'Coffee Politicians Does Create': Coffeehouses and Restoration Political Cultur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7:4 (December 1995): 807-834.
-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ocock, J. G. A. *Politics, Language, and Time: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Pocock, J. G. A.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Richetti, John J. *The Life of Daniel Defoe: A Critical Bi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5.
- Rogers, Pat. *Robinson Crusoe. Unwin Critical Libra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9.
- Rogers, Pat ed. *Defo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
- Rose, Craig. "Providence, Protestant Union and Godly Reformation in the 1690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3 (1993): 151-170.
- Schonhorn, Manuel. *Defoe's Politics: Parliament, Power, Kingship and "Robinson Crus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Sheppard, Kenneth. "J. G. A. Pocock as an Intellectual Historian." In *A Companion to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Richard Whatmore and Brian Young, 113-125.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5.
- Shoemaker, R. B. "Reforming the City: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Campaign in London,

- 1690-1738.” In *Stilling the Grumbling Hive: The Response to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in England, 1689-1750*. Edited by Lee Davison, Tim Hitchcock, Tim Kearns, and R. B. Shoemaker, 99-12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Starr, G. A. *Defoe & Spiritual Autobiograph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 Starr, G. A. “Introduction.” In *Christianity Not as Old as the Creation: The Last of Defoe’s Performances*. Edited by G. A. Starr, by Daniel Defoe.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 Sweet, R. H. “Topographies of Politenes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2 (2002): 355-374.
- Tolonen, Mikko. *Mandeville and Hume: Anatomists of Civil Society*. Oxford: Voltaire Foundation, 2013.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 Wrightson, Keith. *English Society, 1580-168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2.
- Wrightson, Keith. “Estates, Degrees, and Sorts: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Societ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In *Language, History and Class*. Edited by Penelope J. Corfield, 30-52.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 Ylivuori, Soile. *Women and Polite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Bodies, Identities, and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三、網路資料

- Drabble, Margaret, Jenny Stringer, and Daniel Hahn. “Defoe, Daniel.” In *The Concis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214921.001.0001/acref-9780199214921-e-1642>. Accessed June 24. 2019.
- “Fop,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ne 2020, www.oed.com/view/Entry/72746. Accessed 24 July. 2020.
- “Politeness, n.” *OED Onli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019, www.oed.com/view/Entry/146882. Accessed May 12. 2019.

Conversation, Commerce, and Politeness: Daniel Defoe and the Polite Culture of the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Chien-yuen Chen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saw a rise in the popularity of the concept of politeness, and ideals of politeness became well-establish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century, its values and languages spreading through all aspects of England's cultural world. In light of its importance, there are already established studies on representative theorists of politeness such as Joseph Addison and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 However, in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n politen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oe's works and politeness culture is still being discussed. This essay compares Defoe's works with the works of Addison and Shaftesbury. I observe that Defoe agrees with these thinkers that conversation and commerce are the two key factors in politeness culture. Furthermore, I suggest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layers within this culture: Shaftesbury's targeted readers were aristocrats, Addison's were primarily members of the gentry, and Defoe's were tradesme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irst, I present a brief biographical sketch of Defoe and the relevant scholarship on his involvement with politeness culture; second, I provide an overview of politeness culture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on this topic; third, I focus on the role of convers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politeness in Defoe's works, showing how appropriat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contributed to a polite society. Finally, I explore Defoe's belief in the impact of commercial development on the promotion of appropriate conversation and politeness. This study thus highlights Defoe's eagerness to propagate the values of moderate conversation and peaceful interaction in business to the lower-middle classes, concluding that Defoe deserves to be regarded as a notable figure within the culture of politeness.

Keywords: Daniel Defoe, polite culture, commercial society, *The Spectator*